

目 录

- 丰镇县工商业发生、发展、
变化及其组织与作用.....汤 润 (1)
- 丰镇议会选举始末.....丁正贵 (64)
- 师学温烈士传略.....孙 伟 (67)
- 隆盛庄开发与经济兴衰.....贾明贵 (72)
- 同盟会在丰镇的活动.....丁正贵 (82)
- 胡一新烈士生前战友访问记.....孙 伟 (86)

丰镇县工商业发生、发展、变化 及其组织与作用

丰镇县历史简述

丰镇县地处古长城之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南部，东邻兴和县、北连察右前旗，西与凉城、卓资县接壤、南与经济发达的历史名城山西大同相邻，丰镇素有内蒙古门户之称。丰镇这个县是我国北部边陲之地，战国时为赵国管辖，秦统一中国后历经数代，丰镇尚无行政建制，分别属其他县郡管辖，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于高庙子（现兴和县内）和衙门口（现丰镇城所在地）分别设丰川卫、镇宁所，隶大朔理事通判管辖。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裁汰丰川卫、镇宁所，改设丰镇厅。（亦叫抚民府、或称丰府）由大同府阳高通判移驻管理。乾隆三十三年归大同府管辖，光绪七年改由山西省归绥道管辖，民国元年改厅为县。从民国三年划归察哈尔特别区管辖，民国十八年一月复归绥远省，定为一等县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归绥远省辖之县，一九五四年划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丰镇这座小镇已有二百三十七年之久的历史。

丰镇的城垣始建于清雍正年初，乾隆十八年开始修筑城墙，乾隆三十八年扩建城垣，并筑有五门，东门、东北门、西门、西北门、南门。清道光二十年和民国四年又有两次扩大城垣。全城

周长为十四里一百一十一步。城内有大街十六条、小街二十五条、小巷四十六条，筑有八门：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大西门、西阁门、小西门、西北门。解放后县城逐渐向四周扩展，城内大街小巷就增加了许多，总面积为三、六一平方公里。全县的面积有两千八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近三十万，其中城关镇人口有四万七千七百多人。县辖两个镇即：城关镇、隆盛庄镇；十九个乡，一百五十五个村民委员会。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

解放前丰镇工商业发生、发展与变化

丰镇县由于地利优越，加之受内地的影响，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工商各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是现在内蒙古较大的一个县城。工商经营者发展较早，清乾隆年初，丰镇城垣未建前，就有较为殷实富庶万合隆较大的商号，至今年迈老人们还说“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之称。传说：万合隆起先在新城湾乡泽落沟和万成沟开设，后迁到老爷庙街，该号先辈是忻县人，名叫谢光祖，财东叫张千臣。万合隆在老爷庙街就设有四处，连号网点即：东柜是主柜，在庙南隔边，西柜庙对门是零售门面，南柜亦在南门街，开的是大粉坊，北柜在庙北的复兴巷，开碾磨房。万合隆这家商号有二百余年的历史，日本侵入丰镇后才歇业解散的。

清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四年）丰镇城垣建起后，内地大批商贾来丰镇城和隆盛庄经商。所有从业者绝大多数是山西忻州、崞县、定襄人，蔚县、阳高、大同人占少数，因此，在忻县至今还有“丰镇是小忻州”，“丰镇是忻州的咽喉”等说法。所以说忻县人是丰镇工商各业发生的开拓者。在满清朝中期，丰镇县的商号，货栈、手工作坊就逐渐兴起，粮食、牲畜，皮毛、药材、布匹和旅蒙商业贸易也日益开始发展起来，那时丰镇就成了塞外商业贸易

较大的集镇（包括隆盛庄），是物资交易的重地。清末民初丰镇的手工业也繁荣发达起来，当时丰镇、隆盛庄的皮革、毛绒线衣、口袋等（手工艺产品）都是精工制造，品质优良，各地商贩慕名，纷纷来丰镇采购。这时丰镇的商业发展极为繁荣昌盛，尤其是钱、粮布、当、缸、油、碾、面八大行业发展更加繁盛，其次是牲畜、皮毡、绒毛、百货、山货、烟、酒、糖、茶、鲜菜、杂货、生熟肉业、饮食、服务、面食、酿造、国药、运输等近二十个行业以及各类手工艺行业也都迅猛的发展起来。

当时各行各业殷实、富庶，著名的商号：丰、隆两镇有：钱庄业义泰恒、汇丰源、信诚义、西盛隆、天丰永、元巨永、天义元、义源通、茂恒永、义生元、德隆郁、恒丰瑞、得成公、同义昌、源丰永等二十余家；粟店业有：谦合店、德源店、丰泰店、丰盛店、元兴店、广泰店、永巨店、万义店、德远店、同丰店、懋盛店、恒隆店、永泰店、信合店、德生店、义生店、德元店、丰裕店等三十余家；质当业有：德巨当、明巨当、天盛当、天成当、复兴当、明远长、义和当、东福盛当、西福盛当、茂盛当、德裕当、恒盛当、明记当等二十余家；棉布业有：元义长、天德成、公益长、富成昌、兴盛钰、大成德、天义和、德元成、德兴亨、义源兴、广德成、福盛旺、禄顺源、预顺源、巨义公、义源永、裕全隆、义顺和、德泰钰、富丰祥、巨义祥、复巨成、权兴玉、德兴厚、轮华昌等四十余家；不少布店也兼营百货、杂货。此外，货店业有：元和店、义和店、广和店、天合店、大德店、裕全店、义盛店、广兴元、清德店等十余家货店均大宗批发土布、棉花和烟、茶、糖味。缸、油、碾、面业有：三合元、明合源、天合成、义合成、永春发、旺春泉、天盛长、崇和德、崇和钰、广和德、德厚荣、世富昌、西茂泉、德兴永、天裕元、德丰裕、晋泉泰、元和永、德隆益、天福泉、泉丰永、德巨胜、润记等九十余家，其中兼榨油的五十五家，兼制烧酒的十八家。此

外，乡村还有开碾、磨、缸、油房较大的户数十家，如哈少忽洞的天福泉等。烟、茶、糖业有：荣盛公、兴盛丰、德盛公、福茂公、福盛公、巨源丰、增盛源、福盛长、丰胜泉、巨源生、富成祥、万庆厚、元和公、三盛公、巨春和等六十余家。酿造业有：万兴长、万元长、复兴久、义和长、三义泉、广盛泉、天合泉、涌益泉等十余家。面食业有：纯兴昌、天福楼、福兴楼、怀仁馆、天宝昌、天盛明、天福钰、义合成、义合明、文星楼、隆兴源、清德昌、上三元、德兴荣等四十余家。饮食业有：巨宝园、福春园、庆春园、四义园、福盛园、第一楼、清真馆、会丰园、集义园、西玉记、清真寺东馆子等十余家。山货业有：三盛长、敬德长、信诚德、义聚恒、天德瑞、天德永、荣德祥等二十余家。百货业有：万山盛、永山成、有义成、忠义成、新泰合等十余家。绒毛业有：西盛毛店、东盛毛店、义和毛店、广和毛店、永茂毛店、崇义德毛店、巨盛公毛店、庆记毛店、宏记毛店、义记毛店等十余家；此外，还有数家大毡坊也收、售绒毛。当时丰镇是绥远一带绒毛的集中点，各旗、县均来此推销绒毛，毛店收毛都运往天津，经过整、洗后，打成二百斤的捆子，转售洋行出口，换回白银。所以丰镇的十余家大毛店获利非常可观。毛毡业的生意也很兴隆，大的毡坊有：天成万、义生永、天盛厚、天盛泉、天义德、广生永、福顺恒、义合隆、宝积泉等十六家。毡业均是手工作坊，前店后厂。皮业分生皮、熟皮、白皮、黑皮。生皮有：和盛德、双和成、义合荣等五家大户，熟皮有：和盛兴、广顺元、永顺生、永顺长、合顺兴等八家；白皮主要和制毡熟皮合并兼营，制作粗细皮衣；黑皮有二十余家，多系家庭户，由河北枣强人制作。

丰镇县是手工业行发展较早的地方，除皮毡作坊外，在清末民初年代还有制毡、打毛口袋的手工业户十余家，较大的户有：杜记、荆记。即：杜喜、荆绪等人。其他手工业也是应有尽有，

铁业最早有：张忠炉、万诚炉、长盛炉、庆盛炉、永生炉、广元炉等大户就有十几家；木业有：天源森、得胜长、双合成、宋记、翟记、杜记等较大的木铺十三家。翻砂业有：广元炉、广明炉、万诚炉等六家。凿石业有：如意石铺、三义石铺、天顺石铺、公义石厂等五家。银炉业有：天合明、天益亨、天元亨等十余家。隆盛庄还有旅蒙商业、手工业。旅蒙商大庄子有数十辆牛板车，有的有百辆以上，春天拉上米、面、烟、酒、糖、茶和布匹，到蒙古地带出售，换取当地的牲畜、皮、毛；旅蒙手工业主要是铁、木业手艺人，拉上原料和工具到草地为蒙牧民修制用具、家什，换取牲畜、皮毛和土特产品，他们付的辛苦很大，所得利润亦大，隆盛庄跑草地最大的字号有：万合成、天合成、谦合成、万顺成等三十余家，带出草地的手艺匠人有二百余人。在手工行业中，还有：白铁铝锡业、铜业、造纸业、麻绳业、柳编业、制鞋、制帽、成衣和染业等十余个。从事手工业的人员大部分来自山西晋北一带，少数是河北和当地人。手工行业的艺人一般都是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丰镇、隆盛庄的各种手工制品，质量最佳，如销往绥东各地永和全、造纸房产的丰白纸，柳业和义德产的装油、酒篓、卡，鞋业做出的靴、鞋，铜业打出的火锅、茶壶，都是既美观，又耐用，很有名气。

丰镇、隆盛庄是牲畜集散之地，牲畜行业也是十分兴隆的，大数量的牛马、羊群到达后都可住马店。较大的马店有：福兴马店、义和马店、三和义马店、顺义堂马店、六合堂马店等二十家左右。买卖牲畜需要牙纪当经济人（牙纪也叫桥牙子）。丰镇、隆盛庄桥牙子这支队伍异常庞大，牙纪著名的有：刘平福、刘满福、刘满苍、刘大、刘楞随、王义、王明、郭掌福、犹圪旦、张巨林、董德仔、袁头牛、武占元等八百多人。其中包括拉二铧的四百余人。（拉二铧的也是跑桥的，但他们手上的生意不多，帮别的牙纪打下手）牙纪的经验非常丰富，叫他们看牲畜

很有把握，因而买卖双方相信他们，依靠他们成交，他们所得的佣金也很可观。丰镇、隆盛庄的药材行业，除门市部销售中草药和丸、散、膏、丹各种成药外，还向各乡村农民大量收购当地出产的草药，当地生长草药有：黄芩、黄芪、柴胡、秦艽、防风、知母、麻黄、益母草、冬花、车千子等三十余种，药铺廉价收上，装包、打捆发往外埠出售，获利甚厚。当时的药材业有：中和庆、玉成德、德和公、太和堂、双盛隆、双盛魁等十余家。

运输业在一九一五年以前，主要是牛板车拉运为主，板板车虽说拉的重量不大，（每辆拉一千斤左右）行程不快，（每日行四十到五十华里）但是拴板车的户数、车数却很多。据说丰镇、隆盛庄依靠拴牛板车维持生活的竟有五、六百户，承揽拉运粮食、货物的车户共有牛板车及大车，近万辆之多。解放初仍有六千多辆大车、板车，他们的板车组织是结把形式，每把板车均在一百辆以上，仅隆盛庄就有二十多把。拴板车在百辆以上的大户有：土塘的郭五蛋、荆二、东园子的王九如、赵家、大西门的杨金金、四城洼的夏家、郭家等有十余家。还有永羊湾、三义永、高家梁、灯路素等乡村的板车把子二十余个。此外，还有运送南来北往客人的轿车子亦有五、六百辆。

上述各行各业和各类手工业，大户和较大的商户在清末民初时期丰镇县城已发展到八百余家，隆盛庄亦有四百余家。丰镇所辖的二、三、五、六区也有油、酒、米、面、布匹、杂货等较大的商户八十余家。全县总计：有挂金字牌的较大商号一千四百余家。加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户的不断发展，丰镇、隆盛庄的街市十分繁华，各行各业的商号密布于街衢、巷道。在清朝中期各商户的规模不大，据《丰镇厅志》记载：丰镇商贾“日在市廛亦，但利逐蝇头，取给鸱眼微薄贸易而已。所以，俗尚勤俭，有陶唐氏之遗风。”此种商风延续不衰，成为丰镇商业繁荣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清光绪、宣统年间，丰镇、隆盛庄的粮商非常活跃，各地粮商云集于此，丰、隆两镇年成交粮食总数多达五十三万石左右，（每石三百斤以上）收粮大部分销往内地。此时，粮价低廉，市面以银两为主币，以铜制钱为辅币。胡麻、菜籽油料每斗四、五百市钱，粗粮每斗不过三、四百市钱，小麦七、八百市钱。

民国四年九月（一九一五年九月）京绥铁路修到丰镇，并作为临时终点站，由于交通便利，使商业更加发达，丰镇能够与京、津、张家口等地的商人直接发生收购贸易，这里便成了绥东粮油、皮毛、牲畜集散之地。当时人称塞外小旱码头，随着经济发达，丰镇的人口也急剧增长，各行各业又有明显的发展，很快增添了外埠来丰开设的字号，象著名的盛记、协巨成、同益兴、恒丽魁、老三顺、大德兴、元復永、永记煤油庄、颂记煤油庄、积成粮货栈、合顺粮货栈，裕民、鸿记、益兴三家打蛋厂、运输业也有所发展，华兴公司专以运粮食、油料为主，天信裕、福生祥大宗承揽运输业务。随着京、津大商贾来丰，饮食、服务业也更发展了，饮食业又增加适合京、津口味的全顺居、双盛居、玉华春等五家；服务业旅社有：旅安栈、万顺栈、清真栈等十余家；理发、澡堂、照像、修表等业都在兴起。这时中、西药铺发展到二十二户，可见人民的生活也有所提高。总之，丰镇县的工商业户在民国十年前后是最全盛时期，也是经济发展最殷实最繁荣的时期。但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因新军阀混战，市场一度出现萧条，尤其是到了民国十八年丰镇地区农业遭受特大旱灾。粮价成倍上涨，人民生活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不乏其人，使购买力显著下降，商业再度萧条，少数商号关门倒闭。而粟店、陆陈两行不少人却还发了大财。民国十九年到二十一年农业连续收成较好，丰、隆两镇的商户恢复很快。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两镇的

商业较前又有发展壮大，市面十分繁华，物价十分稳定，各种货物既多而且便宜，特别是粮食非常便宜，一块银元可买莜面五十多斤，买胡油、猪肉也能买十斤以上。全县的商业贸易额占绥远省各旗、县中的首位。据民国二十一年县府调查称：全年输出物总值四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元，输入物总值三十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一元，出超数达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七元，足以反映了当时丰镇县的工商业经济繁荣的景况。可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军队侵占了丰镇县城，日军进来的第一天就枪杀了无敌的正当商人——预顺源大布庄的经理张补元先生。这对商业人员中的财东，富商来说是个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七七事变后，丰、隆两镇的工商业户处于衰退疲惫和消亡的状态，日寇占领丰镇八年期间，对工商业户进行了极其野蛮的压榨和残酷的掠夺，使丰镇的工商业异常萧条。首先是“蒙疆银行”大量发行伪币，把钱庄、贷金两业全部挤垮；其次是利用朝鲜人开了两处当铺，把丰隆两镇的十五家当铺尽数破产倒闭；再就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日伪当局严格控制市场，实行了经济封锁的政策，在城乡到处设立“经济监理站”，或叫“经济监视所”，对出进的各种物资强制监理，严密封锁。县城的八个城门，仅开四个，有时开三个，每个城门都设有警察分所一个班，配合日本军日夜轮流把守城门，一方面盘查出、入行人，逮捕所谓“嫌疑分子”更主要的是怕将物资转到八路军手中，更奇怪的是老乡进城买些商品，也往往被抢劫没收，因而许多农民不敢进城买货，致使商号的营业日见萧条。日本统治丰镇后对主要货物实行了专卖，利用“三井洋行”（粮食公司），“监务局”“粮食组合”“土业组合”等专卖机构，大肆统治商户的商品，特别是粮食、皮毛、棉布统治的更严。他们还大量截收手工业生产原料，使传统的手工业陷于破产。不仅如此，并且遍设税卡、征收新税，常有税务人员、便衣、特务、警察等日伪汉奸到各大商号借口检查货物，

清查户口，封冻粮食等事，进行敲诈、勒索。在这黑暗笼罩的年代里，日本人用的汉奸更为恶毒，他们采用的手段是告某字号，私通八路军、共产党，这就先把经理关起，最后致于死地。如把很大的福盛字号（联号就有八家，八大行仅缺一钱庄）张宝库的孙子张钦明就被诬告私通共产党，被扣捕后解到大同，又解张家口后被处死。这样丰镇的工商业户，工业无原料，商业无货源，严重的是一些大户和较大的商号昼夜诚恐、诚慌，根本没有继续搞好生意的设想。日本侵占丰镇八年，不少大商号和较大的字号财东逐渐抽取了财股，柜伙渐渐吃空了铺底，有半数商户倒闭歇业，散伙消亡，幸存者也都被日商控制为气息奄奄，苟延残喘之户。简言之，工商业的经济实力从此衰退、减缩，再无清、民时期那些殷实富庶的大户。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第二次解放了丰镇。丰镇人民八年来受欺凌、受奴役的悲惨生活结束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和关心、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因而丰、隆两镇的工商业有所恢复。但是国民党很快又挑起了新内战，战火连年，使丰镇县成为拉锯战地区。我军在时鼓励动员各商号开业，组织小商贩设点摆摊，繁荣市面。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卷土重来又占领了丰镇，当时他们推行的政策，造成了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压榨商民，并且强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纵容军、警、宪、特和公务人员对工商业户大肆赊欠、敲榨、掠夺，造成了许多商号关门停业和倒闭歇业。许多商号以大化小，市场极度萧条，商业日趋凋零，发展经济更无从谈起。到一九四八年春天，城内仅有的四家粮店完全停业。丰镇解放前夕，城内的工商业户仅有三百八十六家；隆盛庄只剩一百八十五户。比丰镇工商业鼎盛时期的总户数减少了829户。

解放后丰镇工商业的恢复、发展与变化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丰镇县得到解放。由于他们在解放前听了对党的反动宣传和诽谤，各商户人员对党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少商人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因而他们顾虑重重，各商号均不开门营业，只有摊贩维持市面。人民政府为了尽快恢复商业贸易，委派干部深入到商户宣传、阐述党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武达平市长亲自带领干部进驻商会，了解工商业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并说服、动员出生记粮店经理南岳秀当了商会的临时会长，首先恢复了商会的工作。利用商会召开大、小型会议，动员商户开门营业。在大张旗鼓地反复宣传动员下，不少商户开门营业了。人民政府为了繁荣市场，稳定金融，指令银行筹集资金，在市场上投放了足量的本币，即：（农币），还开设了国营贸易商店、货栈、粮店、炭站，在此期间国营商业保持了市场供应，有足量的棉花、土布、白市布、米面、油盐等和人民必需的主要商品。在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贯彻下，新的商户纷纷开张营业。到一九四八年末，城内新开商号有：棉布、杂货、碾磨、饮食、客栈等三十四户。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小摊贩新设网点，逐日增加，丰镇市场又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隆盛庄商业恢复的更快，镇上市面亦很有起色。

有着悠久历史的丰镇工商业，解放初期虽不及清末民初那样殷实、富庶，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地发展起来。截至一九四九年未统计，城隆两镇的商店、铺户，由解放前夕的五百七十一户，发展到八百三十九户，一年来的时间就增长了二百六十八户。一九四九年未在城、隆两镇的二十二个行业统计中，其中有：

粮店业二户；棉布业三十六户，
陆陈业七十六户，烟茶业十九户，
杂货业一百零陆户，百货业十五户，
山货业二十九户，国药业十六户，
饮食业三十二户，面食业五十三户，

鲜菜业四户；肉业二十九户；
估衣业二十二户；旅店业一百三十三户；
货栈业十二户；皮毡业二十九户；
成衣业三十三户；理发业十八户；
修照业三十二户；手工业六十九户；
牛奶业八户；行商及旅蒙商六十六户。

总合计：八百三十九户。另外，两镇还有小商、小贩、小手工业：799户。

与此同时，国营商业在县城已发展了六个，供销合作社商业，从一九四八年底创办以来到一九四九年末，全县除一区外，其他六个区都成立了供销合作社商业门市部。国营、合作社商业已在丰镇县商业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类性质的工商业，团结一致，互相促进，以共同繁荣的新面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情况比较正常，一般商户生意兴隆，有利可图，因而工商业的户、人、资基本稳定。但是到了一九五二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运动初期由于有左的倾向，使一部份商人产生了顾虑，如运动开始就把工商业者称为资产阶级和奸商等等，对一些不够守法的户进行过斗争，有的还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处罚。经过运动虽然多数工商界人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有一些人是决心再不经商了，千方百计的申请歇业，有些人要求转业，有的不辞而别回了原籍，有些到外地找了工作，使全县工商业户、人、资有所缩减。一九五一年末统计全县工商业有一千六百二十一户，从业人员四千一百六十五人，资金七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一万元（户、人、资均包括小商、小贩）。一九五二年末统计全县工商业有：一千二百七十户，从业

人员三千三百九十七人，资金总数为六十万零九千四百四十三万元。这就看出了一部份工商业者是看风使舵，风头不对，就趋向缩减，风头好转又趋向增加，一九五三年末统计的户，人资又略有增加。

随着国家财经情况的根本好转，一九五三年是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国家对工商业虽然公布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改造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但对工商业的改造政策，仍然采取了扶植、发展的政策。当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扶植的办法，主要是：国营商业缩小批发起点，调宽了批零差价，对困难户人民银行给予贷款。并动员私营工商业实行深购、远销、联购、联销，再加上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因而在一九五三年工商业户又有所发展。据城关镇私营工商业一九五三年末的资料统计（以下较大的户指出商号名称），商业方面：

棉布业有：六合源、同义合、双圣祥、谦成章等四十三户，从业人员一百七十四人（其中包括职工、店员六十五人）资金八万七千零四十四万元。

烟茶业有福兴源、诚记、同丰永、永顺和等二十二户，从业人员六十人（包括店员三十五人），资金二万九千五百四十二万元。

文具业有裕民、利民、大华、富记等十户，从业人员二十六人（包括店员、工人十九人），资金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三万元。

山货业有复巨元、信成德、庆丰厚、天源永等二十一户，从业人员五十二人（包括店员二十二户），资金二万七千四百七十六万元。

陆陈业有崇裕和、协和恒、元生成、陈敦诗、天成等三十一户，从业人员一百三十九人（包括工人店员五十八人），资金二

万七千五百四十五万元；

百货业有义中和等十三户，从业人员十五人（包括店员四人），资金七千五百八十万元；

国药业有德益同、积庆长、同盛永、太和堂等十一户，从业人员二十九人（包括店员十人），资金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万元；

货栈业有天和店、德庆店等十二户，从业人员四十三人（包括店员二十六人），资金：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万元；

杂货业有义荣祥、成记、厚记等六十三户，从业人员一百零九人（包括店员四人），资金五千四百四十四万元；

糕点业有谦益和、公合兴等二十六户，从业人员四十七人（包括工人店员十三人），资金七千一百七十万元；

鲜菜业有同益兴、广丰永等五户，从业人员十六人（包括店员七人），资金五千三百二十万元；

旧货业有马连元等二十二户，从业人员三十二人，资金二千八百五十万元；

以上商业座商：

合计十二个行业，二百七十九户，七百四十四人（其中包括工人店员二百六十三人），资金二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四万元。

服务业座商：

饮食业有新新饭庄、景香春、庆春园、巨香楼等十一户，从业人员八十九人（其中劳方七十一人），资金四千四百九十万元；

旅店业：六十三户，从业人员一百六十二人（包括劳方五十六人），资金五千八百二十九万元；

理发业：十五户，从业人员四十四人（其中包括工人二十四

人)，资金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元；

澡堂业：只有荣记澡堂一户，从业人员十七人（其中工人十五名），资金二千四百万元；

染业：六户，从业人员三十四人（包括工人二十一人），资金五千五百一十五万元；

修照业：九户，从业人员十四人（包括店员二人），资金二千六百四十二万元；

牛奶业：八户，从业人员九人，资金一千六百五十三万元；

合计七个行业，一百一十三户，从业人员三百六十九人（其中包括工人店员一百八十九人），资金二万三千六百八十四万元。

工业、手工业座商、铺店有：益兴诚、和合兴、恒记毡房、霖记、玉记胶房、万兴长、万源长、同和糖房天成斋、双和成、翟记、宋记木铺等共计三百四十五户，从业人员九百八十六人（其中包括工人、学徒四百六十一人），资金二十七万四千三百一十一万元。

城关镇的工、商、服务业，座商、铺户总计有七百三十七户，从业人员二千零九十九人（其中包括劳方九百四十三人），资金总额为五十四万五千四百四十九万元。此外，还有行商、摊贩三百零四户，从业人员三百五十五人，资金三万五千五百余万元。从城关镇的工商业户看，于一九五二年末对比，户、人、资均是有增无减。

一九五三年末统计，城关镇工商业户的投资情况，

一百万元以下的有二百五十二户，共计投资为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一万元；

三百万元以下的有二百三十二户，共计投资为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五万元；

五百万元以下的有六十六户，共计投资为：二万八千三百三十五万元；

七百万以下的有四十户，共计投资为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万元；

一千万元以下的有三十四户，共计投资为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五万元；

二千万元以下的有五十五户，共计投资为八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万元；

三千万元以下的有二十九户，共计投资为七万零五百七十一万元；

四千万以下的有六户，共计投资为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万元；

五千万以下的有五户，共计投资为二万二千六百七十五万元；

六千万以下的有三户，共计投资为一万五千六百万；

七千万以下的有二户，共计投资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万元；

七千万以上的有三户，共计投资十七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万元。（其中大型工业益兴诚蛋厂的投资就有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一万）。

从以上投资户的资金数据来看，丰镇县的工商业解放以后是：小户多、中户不多、大户和较大的富庶户很少。这样的变化很明显的看出抗战以前很有名气的殷实大户，已将资财完全抽取走了。所留铺底推给掌柜的，掌柜的又推给了柜伙和店员，解放以后的商户，均是改头换面。如棉布业聚义公改为同义合，预顺源改为六合元、庆隆祥改为谦成章；烟茶业的荣盛公改为同丰永和成记、兴圣丰改为永顺和和晋记，陆陈业的旺春泉改崇裕和等等举不甚举。解放后虽然有所发展，但财资实力却很单薄，绝大部分商户是以人力凭借贷勉帐来维持经营。可见绝大多数工商业

者，是资金无几的资方人员。

在一九五三年末统计隆盛庄商业、服务业座商共有二百零一户。从业人员七百零二人（包括工人店员一百五十三人），资金五万七千六百二十六万元。并有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一百九十三户，从业人员二百九十四人（包括工人、学徒三十一人），共有资金五千五百一十八万元。

一九五三年九月对手工业进行了区分工作，区分其劳资、雇佣、师徒三种关系。区分标准是：记占有生产工具，原料，生产资料，本人不参加主要劳动，雇佣工人、学徒从事商品生产靠剥削工人、学徒的剩余劳动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者，即属于手工业资本家成份，其与工人、学徒的关系应视为劳资关系；凡雇主占有生产资料，本人从事主要技术性的劳动，雇佣少数工人与学徒，作辅助性劳动者，即属于手工业者或独立劳动者成份，双方关系应视为雇佣关系；已参加主要劳动，掌握主要技术的雇主，招雇学徒在一定期间以教学徒技术为主要目的，双方的关系，即为师徒关系。

全县共有二十六个手工行业，应作区分的有三百四十五户，从业人员九百八十六人（包括劳方四百零四人）资金总额为十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六万元。区分结果是：区为劳资关系的四十六户，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三；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一；资金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万元，占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五一；区分为雇佣关系者六十五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九点零一；从业人员二百三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三；资金二万三千九百零一万元，占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四九；区为师徒关系者四十二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一六；从业人员一百二十三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四七；资金为六千三百五十八万元，占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四七；独立劳动者一百九十二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五；从业人

员三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二七，资金为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三万元，占资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四。

通过区分工作，劳资双方的纠纷逐渐减少，进而达到劳资双方真诚团结，推动了手工业逐步发展，为手工业走向集体，合作社、组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进入一九五四年以来，由于粮食、油料和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特别是国营，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壮大，在市场上占领了绝对优势，使私营工商业户出现了营业额下降，一部分工商业户难于维持生产、经营。于是工商联主任说：“过渡时期，就是饿肚时期”。根据这种经济形势和上级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精神，党和政府决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普查工作，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政策。

普查开始，抽组了工作组深入商户首先摸清了底数，计算出每家商号所需的保本营业额和公、私营业额的比重。通过详细核算，城、隆两镇私营商业维持保本营业额，每个月为四百五十七万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新人民币）。其中城关镇三百零八万七千七百八十八元，隆盛庄镇一百四十八万四千二百元。为了保证达到私营商业这项营业额数，城关镇撤销和停止了六个国营、合作社的零售门市部，并退让出六十种畅销商品，对资金有困难的户银行给予贷款，还让一部分商号经销、兼销了四十二种商品（如纸烟、煤油、火柴等）。隆盛庄供销社将文具和付食零售业务全部给私营商户让出，供销社每天还缩短了两小时的营业时间。在澄清情况，调整营业额比重的同时，还有少数户由于人员多，还达不到保本，政府还给一些商号将职工店员调往国、合企业二十余人。如棉布业同义合经理陈有三很守法，并且在工商界很有影响，但该号从业人员过多，在反复动员做好思想工作后，协商调往国、合企业职工有：蔡桂友、赵子恒、郝秉怀、颜敬修、赵起

五名，又征得本人同意后将年老多病的柜伙金建伍、马宪、王建章、李有官、李有章五名也缩减下来。（全行业合营时又都做了适当安排）。

这次普查，对商业市场作了全面安排，城关镇共安排座商一百八十七户，从业人员四百五十三人；安排小商一百零六户，从业人员一百一十一人。隆盛庄在调查，安排中、把全镇的商业户分四种形式组织起来：

一、组织合作商店一个，由棉布、百货业七户组成；

二、组织合作小组三个，由杂货业十八户组成；

三、组织合营商店一个，由国药业四户和供销社合营；

四、其余座商与摊贩，都组成了经营小组。以上四种组织都归口供销社领导。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私营商业得到了稳定，营业情况有所好转，营业额比以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棉布业六合源未安排前，第二季度营业额为二万零零零一元（新人民币），而在第三季度增加到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九元。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点三，大部分商户维持了保本，一部分户还有盈余。从而调动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表示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争取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从而促进了企业的改造。合营前的一九五五年六月城关镇棉布业有十四户挂上了经销的牌子，（其中谦成章一户的经理思想改造较为显著，批准挂上了代销的牌子）。还有粮、油、肉业也都挂了代销店的牌子。而后又有百货业十五户，文具业二户，食杂、日杂业八十八户，计一百零六户都与国营公司建立了经销、兼销或批购零销关系，挂上了经销、兼销牌子。零销烟、酒的座商有五十六户挂出了专卖公司的经销牌子。还有二百七十五户（多系摊贩）也有了归口领导。只有七十二户找不到归口（货栈、杂营和行商）。

一九五五年第二季度又组织了私私联营，在工商联的帮助撮

合下，很快联合起来了。经工商联报请政府批准，文具业三户联营为一户；百货业二十一户联营为四户；还有棉布业的小户也自动联营经批准有三联五联等私私联营企业。工商联协助处理了联营户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联合对象，门市点地址，资金、债务等事。

对私营商业扶持安排的同时，对私营工业、手工业同样进行了扶持改造。对其主要是采取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形式。一九五三年后半年就有碾磨业、皮毡业、铁木和柳编等行业实行了加工订货、订立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合同。到一九五四年六月间城关镇在三百四十五户，从业人员九百八十六人的整个手工业中，加工订货的户数就发展到一百六十三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五三年加工订货总值为四亿八千五百一十一万元，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四，到一九五四年加工订货已上升到三十五亿六千零零三万元。较一九五三年同期增长了近七倍，加工订货占生产总值也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三。

在这一时期经过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积极改造政策的正确贯彻，发展普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使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以利于限制其消极因素，调动和利用其积极因素。但对企业的性质和掌握企业的三权，还没有根本改变。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初，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才转入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一九五五年初，大型工业益兴诚蛋厂，再次提出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党和政府考虑到该厂已具备了合营条件，三月初批准了该厂的申请，并抽组了工作组进厂工作，到一九五五年七月胜利地完成了益兴诚蛋厂的合营任务。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

在蛋厂合营后的时隔不久，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决议》文件精神，首先组成了私改五人领导小组，下设私改办公室。领导成员有：组织部长杨勤宝、财贸部长赵仁甫、统战部长张宗义、工商科长刘玉堂、工会主席魏瑜，私改办公室主任巩兴。抽组参加私改的工作干部共有五十二人，分行业编为十二个工作组。工作组在反复学习私改方针、政策的同时，深刻研究讨论了进入行业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在各行业的工商业户、单位、街道干部和工商界家属子女中，大力宣传贯彻党的私改方针、政策，使政策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元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全县五十五个行业全部递上了合营申请书，根据各行业的申请于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宣布批准各行业分别参加过渡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组织的形式。紧接着在一月二十九日就召开了全县（包括一、八两区农民）庆祝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大会，大会开的十分热烈，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与会者兴高彩烈，心情舒畅，共同庆祝我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大会以后就全面转入清产核资工作。清产做到了不重、不漏，核资达到了公平合理。同时工作进度很快，仅用五天时间就基本结束了。

在清产核资工作之后，县委私改五人领导小组，遵照上级指示精神，研究决定了，直接过渡、公私合营、合作组织三种形式。

直接过渡到国营、供销合作社的有

国药业、粮、油代销、肉类代销和肠衣等七个行业，共二十三户，从业人员七十九人（包括工人十二人），核定股金投资一万六千二百四十六元，工商业者拿定息的共六十七人。

隆盛庄过渡到供销社有：棉布、杂货、糕点和服务业等十个行业，共九十户，从业人员一百九十六人（包括工人店员二十

人),核定股金投资总额为八万六千零六十九元,工商业者有一百六十七人。

参加公私合营的有:

棉布业:共十二户,从业人员六十二人(包括店员工人二十一人),核定投资共计五万四千二百七十元。

百货文具业:共六户,从业人员三十七人(包括店员四人)核定投资二万三千九百零二元。

食杂业:共四十七户,从业人员一百四十一人(包括店员十四人),核定投资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七元。

日用百货业:共二十一户,从业人员三十八人(包括店员十一人),核定投资二万一千二百四十三元。

烟酒业:共合营四十二户,从业人员五十三人(包括店员二人),核定投资九千八百三十三元。

酿造鲜菜业:共合营二十九户,从业人员九十四人(包括店员、工人五十三人),核定投资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元。

碾磨、炸油业:共二十六户,从业人员一百一十五人(包括工人店员七十九人),核定投资二万二千一百零二元。

隆盛庄碾磨、炸油业:十二户,从业人员四十五人(包括工人店员十九人),核定投资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九元。

皮毛业:共六户,从业人员二十八人(包括工人八人),核定投资六千五百九十一元。

印刷业:共五户,从业人员四十六人(包括工人二十四人),核定投资总额为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四元。

益兴诚蛋厂:一户,从业人员二百九十七人(包括工人、职员二百九十三人),核定投资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一元。

货栈业:二户,从业人员六人(包括店员一人),核定投资三千七百零五元。

澡堂业：一户，从业人员十五人（包括工人十三人），核定投资一千二百一十三元。

照像业：共三户，从业人员十三人（包括工人五人），核定投资六千八百七十九元。

理发业：八户，从业人员四十一人（包括工人、学徒二十人），核定投资三千八百五十元。

染业：四户，从业人员十一人（包括工人六人），核定投资一千九百元。

饮食业：十七户，从业人员四十三人（包括工人二十五人），核定投资七千六百九十八元。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私营工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直接过渡到国营。合作社企业和参加公私合营企业的总计：三百六十一户，从业人员一千三百五十九人（其中包括劳方工人店员六百二十七人），核定投资、定股定息和发放股票的总金额为四十九万七千七百三十八元。按年息五厘计算，每年发放股息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七元。定息一直发到一九六六年九月末整整十年。所投股金基本上未动，仍归各个归口企业使用。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八十四号文件规定：“资金问题，待后再议”的精神，任何人也不得提取动用。

商业、服务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有

组织中心合作商店一个，从业人员一百三十五人，投资金额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元。该店并兼管小贩合作小组十四个。

旧货估衣合作商店一个，从业人员三十七人，投资金额八千四百九十元。

组织合作旅社、合作车马店二个，从业人员一百六十二人，投资金额六千八百二十九元。

组织合作牛奶站一个，从业人员十四人，投资金额五千元整。

此外，还组织了面食、饮食、蔬菜、钉鞋、挑贩、石灰、草炭、五金、服务、行商、刻字十一个合作小组。

手工业除参加公私合营的三十九户和以前成立的合作社、组外，又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九个，合作生产小组九个，从业人员八百七十八人，入社、组股金三万二千一百二十五元。另有自负盈亏的个体手工业四百三十五人，挂名组织了合作生产小组三十六个。

在手工业户中属于劳资关系的仅存下五户，其中制鞋、成衣、黑皮各一户，木工业二户，这五户也随着大多数手工业户走了合作化道路，其资金亦未定息，除去入社股金外，余款分期逐渐归还了本人。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人事安排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它是贯彻落实党对工商界“赎买”政策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工商界极为关心的主要问题。为此，根据工商界人士的历史、威望、代表性和才能，并参照原安排的政治职务和在私营企业的实职进行了安排。安排方法是：由私改领导小组、工商联领导成员和公私双方代表，组成了人事安排协商小组，协商小组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准备安排人员的情况和意见，然后交工商联委员会研讨成熟后，工商联正式提名，呈报县委批准，由政府任命。

这项工作从二月四日到七日，仅用了四天时间就顺利地结束了。在六月间调整商业网和经济改组中人员有所变动。其结果是：工商界人士安排职务的共有一百一十七名，职工、店员安排职务的共二十七人；派去的公方代表也分别安排为经理、副经理、厂长、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的共十七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县对工商界人士的安排，大体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工商界的上层人士八名，他们是：

陈友三任命为纺织品公司副经理，（后调任为医药公司副经

理)。

赵怀谦任命为工业品经理部副经理，(后调贸易公司、百货公司任副经理、经理之职)。

吴鸿勋任命为公私合营益兴诚蛋厂厂长。

苏大德任命为公私合营益兴诚蛋厂副厂长。

焦树详任命为公私合营益兴诚蛋厂副厂长。

赵子亮任命为畜产采购站副站长，(后调县供销社任副主任)。

高容任命为隆盛庄供销社副主任。

蔡桂发任命为蔬菜公司副经理。

二类是工商联委员和工商界中知名骨干，共安排了二十人，即有。

芦宗义任命为公私合营百货总店经理。

张守谋任命为公私合营棉布总店副经理。

孙仰儒任命为公私合营棉布总店副经理。

郭致福任命为公私合营食杂总店副经理。

赵培珍任命为公私合营食杂总店副经理。

张连元任命为公私合营日用百货总店副经理。

赵志孔任命为公营合营烟酒总店副经理。

刘银任命为公私合营烟酒总店副经理。

王文轩任命公私合营服务总店副经理。

邢端任命公私合营服务总店副经理。

郝文任命服务总店副经理，兼国营食堂经理。

王佃元任命公私合营粮食加工厂厂长。

刘存怀任命公私合营隆盛庄粮油加工厂副厂长。

张普林任命公私合营油脂加工厂副厂长。

张汉山任命公私合营印刷厂副厂长。

刘仁任命公私合营皮毛厂副厂长。

白松煜任命公私合营酿造厂副厂长。

王生明任命公私合营酿造厂副厂长。

胡英华任命公私合营糕点厂副厂长。

刘连魁任命公私合营糕点厂副厂长。

三类是：原同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较大商号的原经付理安排为公私合营总店、厂，下设的门市部任门市主任、副主任、经理、副经理的共八十四人。

此外，在合作组织中，还安排了原工商界同业委员会的主任五名，他们是：

中心合作商店组成后，调烟酒总店刘银为中心合作商店的经理。

合作旅社安排王珍为总社主任。

合作车马店安排石海牛为总店主任。

合作牛奶站安排郭步星为站主任。

合作旧货商店安排顾君为商店主任。

上述被安排职务的人员，是多年来在工商界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他们在工商界中已形成了核心力量，他们的行动对整个工商界是有很大大影响的。这部份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比较坚定，他们在“文革”以前的十年任职期间，对改进生产、经营、改善服务态度，加强企业管理和勤俭办企业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十年动乱初就一律被罢免了职务。合营企业也统一归并为国营、公营企业（公营企业是指粮食、物资、外贸等局）。

到一九五六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改变，丰镇县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丰镇县工商业组织沿革及其任务与作用

丰镇、隆盛庄两商会（亦称商务会）

丰镇商会自清末宣统三年（一九〇九年）成立至一九四八年

丰镇解放解散，计有三十九年的历史，隆盛庄商会成立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八年解散，亦有三十五年的历史。

商会是旧社会商人的行会组织，丰镇、隆盛庄两商会未成立之前，工商行业都有自己的行帮组织——行会，其负责人称：行头、隆盛庄称铺头，负责管理本行内部的公共事务，而全城、镇商业之公共事务则由钱、粮、布、当、缸、油、碾、面八大行组成的八行公所，共同管理，各行头、铺头轮流负责。两商会成立以后，八行、铺头均为商会委员，但他们仍然操纵本行业的财务权，摊派、收支均由他们处理，商会开支亦由八行共同负担。一直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以后，财务权力才归于商会。

商会设正、副会长委员等职。委员由各同业公会行户中选举产生，正、副会长由委员中推选。委员中除少数几个人外，其余均为配位而已，尤其是小行业选出的委员，更不发挥作用，即使召开全委会议，也都是图形式，走过场，久而久之，委员们无人过问会务，逐渐形成了正、副会长独揽会务大权的状况。为此，商会大权一直被大商号的经理和地方绅士所操纵。商会的活动：对上主要由会长和地方有名望的绅士出面，对下则用各行业的行牌或用铜锣传达通知，各行业花户接到行牌和听到锣声后，有如接到命令，必须遵照执行。

丰镇县城商会成立后的三十七年中，据不够完全的调查材料估计，先后进行过近二十次改选，大多数是连选连任。其历次选出主要掌权的会长有以下十五人，他们的顺序是：

- 郜绍业，粮店业，谦合店的经理；
- 杨映渊，粮店业，丰盛粮店经理；
- 麻上国，棉布业，元义长的财东兼经理；
- 张仰贤，钱庄业，汇丰源，经理；
- 温淑娇，陆陈业，世富昌，财东兼经理；
- 蔚采楨，棉布业，公益长，经理；

郝 昱：粮店业，同丰店，经理；
麻上元：棉布业，预顺源，经理兼财东；
李国贤：杂货业，巨源丰，经理；
张 剑：棉布业，义元兴，财东兼经理；
孙建成：陆陈业，复明源，经理；
赵在成：棉布业，义德长，财东兼经理；
南岳秀：陆陈业，巨义昌，经理；
赵 岐：杂货业，成 记，经理；
郝 钰：棉布业，庆隆祥，经理。

隆盛庄商会成立至解散三十五年中，每年三月三日改选一次，但绝大多数亦是连选连任，先后担任过会长的有如下十人。

顺序是：

张士廉：红炉业，长盛炉，财东（地方绅士），
张吉威：粮店业，德生店，经理；
卢富财：棉百业，富丰祥，财东；
阎仁瑞：质当业，茂盛当，财东；
杜元斌：货店业，天有店，经理；
郭相荣：栗店业，丰裕店，副经理；
郭生银：钱铺业，茂恒永，副经理；
郭维平：陆陈业，天福全，副经理；
李 芳：棉布业，巨义祥，副经理；
高 容：棉百业，富瑞祥，经理。

城、隆两镇商会的正、副会长一般由大商号，联号多，财势雄厚者担任。日寇侵占后，发生了变化，财势雄厚者不愿出面担任此职，此时的会长则由商会委员推选一些大行业中较能干的人充任。这样丰镇城自郝昱、隆盛庄自郭维平以后的数任会长，就其商号和财势较前几任大为逊色。

丰、隆两镇商会成立后，除正、副会长外，内部还设有交际

員、文牒、會計、庶務、書記員各一人；有的是二人。丰鎮商會的交際員（也叫抗差的）擔任最年多的有：王時公、弋龍；文牒有馬子榮，蔡如山；隆盛莊任職交際員最年多的是劉升堂、盧富財。此外，兩商會還各有差人即工友五到七人。日寇侵占后丰鎮商會又設日籍顧問一人名叫內藤，他是由日偽縣公署的輔佐官兼任的，翻譯一人，名叫李化南，主事一人由弋龍擔任。商會內部又設四個股。總務股，股長馬子榮；業務股，股長王子元，調查股，股長孫化武，組合股，股長田步山。四個股統歸顧問、主事指揮，每股有雇員若干人，共有二十六人。隆盛莊商會工作人員常年不下十幾個人。工作繁忙時各行頭舖頭均來會協助工作（隆盛莊商會稱行頭為舖頭）丰鎮商會與隆盛莊商會所不同之處就是：丰鎮擔任會長沒有報酬，而隆盛莊不論何人凡擔任會長的人，每年年終饋送白洋三百到五百元，作為報酬。

丰、隆兩商會的經費和攤款，開頭是按大、中、小、等外戶、免費戶分五等。后因負擔不够合理，行戶反對，改為十等，仍有等外戶和免費戶。但無論五等或十等都是兩頭戶數少，中間戶數多。商會經費每月有定額。攤款主要是支差，則无定額。商會經費和攤款在等內者，一般均按數收繳，而等外戶和免費戶，因均系極小戶，如小服務業、小手工業、小雜貨舖和雜販等，戶數亦常有變化，攤款雖有不大的數目，名曰“帶行”均由收繳人員自行掌握，酌情處理。其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等弊端大有人在，所以當時人稱商會工作人員是“肥差”。

丰、隆兩商會的主要工作有以下七項：

（一）支差。兩商會自始至終支差為其最大的任務。支差所耗財力、物力極其巨大，如蔣、閻、馮軍閥混戰時期，過往軍隊甚多。商會又專門設立了支應局。支應費用竟達四十多萬銀元。

支差物資多以糧食、油肉、飼料和使用家俱為主，其他也无一不要，无一不给。支應對象主要是軍隊，但地方上的行政官員

亦在其中。尤其是日寇侵占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支应的面更广，支应的物资更庞杂，无法计算，无法澄清。支差所用款项均由商会向工商业户摊派。其物资，有按质论价者，亦有暂借归还者，不给价、少给价、减价或拖欠以及物顶价，借好还次者，亦大有其事。

(二) 保护工商行户的利益，操纵垄断金融市场。在“七七”事变以前，丰镇县的金融一直掌握在二十余家钱、粮、货行大户手中。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前，（民国七年废两改元）货币极其复杂，金融异常混乱。合于币制的，流通上有：现银，（通用于对外贸易，汇兑完纳赋税，交付公款市面使用不广）。现制钱，（通用于市面，但因携带不便，对外流通数量较少）。银元和铜元，（银元先为辅币，逐渐转为主币，铜元始终为辅币）这四种币换算标准，每日有变，高低不一，均由钱行掌握着（市价长落虽随地区市场行情变化而变化，但也不尽如此）。各大钱庄、粮店和大货行商户，由于有商会的保护，又互相勾通，巧立名目，独出心裁地发明了许多丰镇独有的私商货币，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币制，更加混乱不堪。私商的货币是：

1、谱卜银，均无实物，凡能在钱、粮行户中立户，且以银本作往来帐户者，均按谱卜银计算。谱卜银价高于现银，存入谱卜银均有利息（三日一算）若存现银则无利息。现银与谱卜银兑换时，须补贴谱、现差价。谱卜银逐日有市价，但高低不一。

2、谱卜钞。是粮店、钱行自制的钱票，（俗称：钱贴子，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耍雀弄鸽子，一辈子也拾不住张钱贴子”）。此票信誉昭著，只有十余家粮店和几家大钱庄能出。谱卜钞的周转，使用与谱卜银相同。

以上这两种货币流通，均使市面上现制钱与谱卜钱的价值差距愈来愈远。到后来最低时，现制钱每吊仅值谱卜钱的百分之七十一。而谱卜钱和现银价的距离高低都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以

上。

3、顶转钱。它是货行（主要是棉布、杂货行）自制的。其形式为：三寸长、二寸宽的小票（麻纸、毛笔字、加盖本字号的水印）名曰飞子。使用方法：若向某一商号取钱（现制钱）对方便开此飞子，转其乙号，乙号又开此飞子转其丙号，来回飞转，固人称为“转城壕钱”。愈转愈不值钱。

4、谱卜银元。民国七年废两改元后，不到一年时间，谱卜银、钞、顶转钱都失去了作用，使用不灵，现制钱也周转停滞，钱、粮行便发明了谱卜银元，其使用周转与谱卜银相同。此时市面上通行的货币是：现银元、钞票、现铜元三种。谱卜银元又高于现银币和钞票的价值，而铜元则贬值，四百枚铜元，仅值一元银币。使用以上这些货币，往往使各工商行户。大得其利，商会又给以合法的保护，固确定了商会在各工商行户中的地位 and 威望。而四乡农民、城镇市民、小手工业者则深受其害。他们的劳动所得，全部是制钱和顶转钱。

（三）包庇虎盘，大搞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当地人称之为“虎盘”。其影响经济，冲击物价，危害人民生活。历代政府均严行禁止。唯丰镇和隆盛庄的银盘、特别是粮盘，自清末起至民国二十年，从未禁绝。成为钱、粮两行商户增加财富，牟取暴利的主要途径。商会的会长们充当其后台，有的并亲自参与，致使这项投机生意有持无恐，从未收敛。在每次的银、粮虎盘中，一些小的商户，深受危害，轻者倒闭歇业，重者倾家荡产，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民生活逐渐下降。

（四）增加粮食斗佣。（佣金）恣意剥削农民。丰镇、隆盛庄向来是绥东五县的粮食积散之地。粮源丰富，粮店云集，财经雄厚，获利壮观，为绥远省手屈一指。最初农民向粮店卖粮，粮店收斗佣二分。此项收入已为不少，但粮店遂想将斗佣增为三分。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起，商会就代粮店（行），

向政府呈请过三次，因关系重大，县政府未敢允准。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地方大灾，粮食昂贵，商会即联络兴和、凉城、陶林、集宁四县的商会，各派代表一人，以“申请增加斗用三分，碑碓粮店营业”为由，向省财政厅申请，亦未奏效。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山西骑兵司令赵承绶在丰镇大西街开设德远粮店，商会便以赵为靠山，重提旧案，经赵在省内多方关照，粮店亦大搞行贿之手段，最后由绥远省政府批准按二分五厘扣除斗佣。粮店增加了斗佣，农民加重了负担。各粮店仅此一项每年可增加收入三万多元银洋。

（五）成立保商团。民国十六年秋天，军阀混战，市面不稳。商会为保护城内工商行户的利益，遂雇用白派芝（又名白鸿玉崞县人）为队长，又雇兵丁十几名，成立了保商团。以后逐渐发展扩充为保商团一队、二队，又增队长一名叫陶胡，两队计有团丁四十多名，又派庶务一名，伙夫四名。一切开支均由商会支付。隆盛庄商会于此同时也成立了保商团，由两棚，发展为骑兵两棚，步兵两棚。买枪、买马所花巨款均由商会支付。

（六）维护地方治安。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员王虎臣发动本县“小状元”等几百人参加革命军，攻克丰镇城，但因内部纪律不严，一些士兵多有侵犯地方，市民商户极为恐慌。商会会长部绍业等与王虎臣进行联系协商，并借给革命军饷银三万五千俩，犒劳军队，维持地方，保护市民商贾再未受侵犯。直奉战争时，奉军郑泽生闻知丰镇城内守军退却，便绕道驰来，企图大肆抢掠；蒋、阎、冯大战时，城内冯军退走，兵痞王伶子纠结残匪，抢夺城内军警枪支，声言血洗丰镇，两次危急关头，均由商会出面，相机应酬，使地方受损失很少。其他如土匪抢劫，军丁刁难，商会则主动出面应酬，使地方少受各种骚扰。

（七）办理工商行户的共同事务，促进工商业发展。这是商会的最高宗旨。凡参加商会的各商行，除应支付商会摊派之外，

各商号内部发生重大事情，均呈报商会，由商会出面调停，协助解决。如各商行户，若需向政府和法律机关呈请和诉讼时，商会代其出面。再如领财掌柜与财东、或柜伙与掌柜之间、商户与商户互相之间发生吭、诈、拐、骗或是发生其他矛盾和纠纷，商会均有权出面干涉。其次是商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时，商会则公开为商行辩护。对于城内各商行的产品、货物、价格、市场销售和输入、输出等方面，商会都有权过问。尤其是每次较大的物价变动，都由商会统一掌握，以便稳定市场（相对而言）同时对于发展工商业，发挥了一定的组织作用。

总而言之，商会的主要任务与作用是维护各商号利益的一个机构。

丰镇县城关区暨隆盛庄解放初 的工商联合会（亦称商联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共计有四年半的历史。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丰镇城最后得到解放。当时大小商户都闭门停业，只有摊贩维持市面。人民政府为了尽快恢复市面的商业贸易，首先需恢复商会工作，但因商会会长理事等负责人和数家大商号的头面人物相随潜逃绥远省，商会的一般办事人员各自回家，均不敢露面，唯恐国民党重返受害，这样造成了商会无人理事。后经我党政军大力宣传党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在主要领导同志的反复动员下，于十一月间，成立了城关区临时商会，推选姓记粮店经理南岳秀（又名南补根）为临时会长。隆盛庄商会和后改的工商联合会，一直都是棉布业富瑞祥经理高容担任会长和主任。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丰镇县城关区召开了首届工商联合会代表会议。会上选举棉布业三茂长经理智俊山为会长、棉布业

义和店柜伙连海云、摊贩业赵连璧，旅店行业书记马振才为副会长。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城关区工商联合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改选了工商联合会会长、副会长。选举结果：选出执行委员十一人，候补委员二人。委员会推选棉布业成记经理周元成为正会长，赵连璧、马振才连选连任为副会长。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城关区工商联合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改选了执委会，选举新执委十一人，候补委员二人，委员会产生会长一人是棉布业德巨元经理郭进仁，副会长二人是县供销合作社主任李进仁和马振才。

一九五二年元月十七日城关区工商联合会召开了第四次会员代表会议。改选了工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选出委员十人，候补委员三人，委员会推选棉布业同义合经理陈友三为主任委员，人民银行行长阎毓霖、棉布业谦成章经理赵怀谦二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粮食公司副经理蒋珠、百货公司经理王济民、皮毡业积记经理李效堂、益兴诚蛋厂副经理苏大德、陆陈业元生成经理王佃元、烟茶业同丰永经理赵培珍、马振才，候补委员有杂货业赵志孔、手工业孙守礼、姚永安。马振才兼任秘书。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城关区工商联合会召开了第五次会员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选举增补了皮毡业恒记经理赵子亮为副主任委员，增补委员有：棉布业双圣祥经理蔡桂发、供销社主任杨玉祯，酿造业万元长经理王生明。上届的主任委员和委员未变动，马振才继任秘书工作。这届委员会工作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城关区工商联合会和隆盛庄工商联合会解消改组。正式成立了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

原城隆两工商联合会（以下简称两会）从解放初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共有四年半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保护、扶植的政策，让其恢复和

发展。两会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人民团体的重要作用。

城、隆两会会章总的精神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所有丰镇县城区各国营、合作社及私营工厂、商号、手工作坊、摊贩均为两会的联合组织成员，是两会的当然会员。它的宗旨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执行人民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团结两会各公、私大小工商业单位互助合作，恢复与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丰镇而共同努力。

两会会章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宣传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教育私营工商业者改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严格取缔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违法活动的商业；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参加学习，参加各种爱国活动。经常调查了解与统计各类工商业户，人、资及其经营状况和存在问题，向有关领导部门做报告；调查了解市场物资交流、金融、物价和物资出入境情况，并研究其原因向政府有关方面报告；调查处理会员之间的争议，登记工商业人会，对工商业户开、转、歇业和证件遗失补领及换发营业执照，先经两会签注意见，盖章证明后，始得向政府呈请批准，方为有效；两会配合税局、工会民主评议税收负担，调解劳资关系及各种矛盾，代表工商业户的合法利益。

两会经费开支，只限于两会及各同业公会职员薪金和办公费用，经委员会审核批准后，由各会员交纳之。

四年多来两会的具体工作任务及所起作用、简述有如下六项

(一) 领导全体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凡大的节日“五一”“国庆”和其他庆祝大会，都要发动和领导全体工商界人员普遍参加。特别是开展较大的工作或运动，都要由工商联领导主持进行，如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中，两会发动全体工

商业户普遍进行了较大金额的捐献，在深入发动捐献中，城关镇仅益兴诚蛋厂一户就捐献买飞机、大炮款伍千万元(旧人民币)。

(二) 组织工商界人士参加学习，开始学习了党的政策，法令和时事，后来主要学习共同纲领文件。学习方式：先以工商联联合会委员和同业公会负责人，每日利用早晚业余时间到会学习一次，并由行业干部给予辅导。

(三) 业务辅导：引导全县工商业者认真遵守共同纲领，教育他们爱国守法，充分发挥其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加资金，增添店员，工人和学徒。订出生产经营计划，扩大经营范围，改善经营方法，树立新的经营作风，明码实价，出入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达到服务态度好，秤平斗满尺码足，货有箴，不抬价，不要谎和取缔白洋黑市活动，以繁荣城乡经济。在手工业中教育会员提高产品规格质量，提高与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批判粗制滥造，以达到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四) 五反运动：这场运动在工商界中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改造运动。根据人民政府指示精神，我县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工商联成立了五反增产节约委员会。委员会是以陈友山、赵子亮、赵怀谦、马振才等同志为首共十三人组成，工商联设立了五反办公室，接待室，挂出检举揭发意见箱。并组成有各行业主任参加的工作组，深入工商业户中进行宣传，让他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彻底坦白，勇敢检举揭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运动开始时工商业者抱着怀疑、顾虑和挨整的态度，认为五反运动是消灭私人资本，并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吃完赔光算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虽仍有部分人还是惶惶不安，抱着闯关思想，但后经工商联的几次大会动员，小会座谈，特别是工商的几位主任在大会上对五反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讲解，说明了五反运动与工商界关系重大，并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旧社会里谁

能行贿，搬门子，谁就有本事发财，而在新社会里就必须挖掉这种坏根子，把旧社会带来的腐朽污毒洗刷干净，这次运动就是考验我们，大家一定要打消一切顾虑，彻底坦白交待所有的问题，大胆揭发检举别人，以改正错误，重作新人，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新工商业者，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绝对不准对工人，店员威胁和与受贿者订立攻守同盟，进行闯关等事情。最后工商联的几位主任们还在工商界面前带头检查了各自柜上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偷漏税收行为。

接着主任们又号召工商联的委员要首先检查交待，并要求所有工商界的骨干分子都要参加五反工作。领导骨干的言行对广大工商界人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们的号召和具体行动对五反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因而在大会后，进行小会座谈时就有六位较大商号的经理当众坦白交待了他们所犯的“五毒”问题。

这次运动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工商界领导骨干的积极带头，使全县工商业户，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先后有七百八十五户书面交待出违犯五毒案两千四百三十九件。经政府一一审理从轻处理了这些案件。于同年九月结束了这场运动。经过五反运动，使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三反五反是为了治病救人，绝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从而鼓舞了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以前认为没有经营前途停业和准备歇业的，运动后看到了党的政策就是好又及时复了业。

(五)领导和推动全县工商业户修订爱国公约，这次修订增加了五不内容即：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资财，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公约中对一切欺骗和高抬市价、投机取巧，掺沙拌水，以次顶好等事也是主要内容。从此广大工商业户违犯公约内容的事情很少发生了。

掌握工商业户的基本情况也是工商联联合会的任务之一，两会经常调查研究，统计工商业户的户、人、资及营业额的基本数字

上报政府，并传达贯彻政府的各项指导工作；协助政府对手工行业进行了排队，使其产品与供应平衡，适应市场需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工商业户的正当要求和意见，协助工商业户解决实际困难等问题。

（六）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商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协助税局评议税议和保证税金及时入库；配合政府开好春秋两季的物资交流大会。两会抽组专人动员和带领商号下乡参加农村的物资交流大会，以繁荣城乡经济。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市场；与工会配合搞好劳资双方的关系，处理劳资纠纷，达到劳资团结；配合爱委会搞好爱国卫生活动；动员各商号搞自愿捐款节日开展慰问军烈属的拥军优属活动。

总之，在解放初两会切实做了大量工作，协助党和人民政府为恢复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作出了一定贡献，给党和人民政府真正起到助手作用。

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

根据一九五二年八月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于一九五三年正式成立了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召开了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会期三天到七日顺利闭幕。参加大会的代表城、隆两区共八十七人（其中国营代表十一人，私营代表七十六人，城、隆两区比例为三比一）。大会通过将隆盛庄工商联合会改为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下设隆盛庄分会；把原丰镇县城关区工商联合会解消。大会还通过原城、隆两会的二十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切财物、档案尽数移交，由县工商业联合会接受。大会最后进行了选举，选出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执委十九人，监委五人，委员会产生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三人。选举结果是：棉布业同义合经理陈友三当选主任委员，人民银行行长阎泽民、皮毛业恒记经理赵子亮、隆盛

庄黎民商号经理高容三人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棉布业双圣祥经理蔡桂发当选监委主任。马振才担任秘书。为了加强会务工作，县委给工商联调去宣传部乔作仁、组织部杨润到工商联工作。这时工商联实有工作人员二十三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到十日胜利闭幕。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七十六人。这次大会换届选举了执员二十四人，执委中产生常委十一人，常委有：陈友三、刘玉堂、赵子亮、高容、卢宗义、赵怀谦、栗金魁、杨国柱、蔡桂发、郭致福、高风鸣。常委会又选举了医药公司副经理陈友三为主任委员，工商科科长刘玉堂、畜产站副站长赵子亮、公私合营百货总店经理卢宗义、隆盛庄供销社副主任高容为副主任委员，马振才继任秘书。在五八年精简机构中调出工商联干部十三人，马振才调县人民委员会工作，由杨润临时负责会务工作。此时工商联实有工作人员十人。一九五八年九月卢宗义被错划右派，十月被撤消职务。一九五九年五月赵子亮被错打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并撤消了工商联副主任职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到十一日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共七十人。这次大会改选了工商联委员会，选出委员二十五人，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十三人，有：陈友三、刘玉堂、高容、张守谋、赵怀谦、王士升、蔡桂发、段乐天、刘仁、邢端、王佃元、郭致福、高风鸣。常委会选举陈友三为主任委员，刘玉堂、高容和棉百总店副经理张守谋为副主任委员。同时县委组织部任命杨润担任秘书工作。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到十二日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七十八人。这次大会进行的时间长，主要传达贯彻中央和内蒙召开的“神仙会”精神，县委程林彬副书记到会作了长达四小时的重要讲话。大会结束前，选出了

工商联委员会，计有委员二十五人，委员会产生常委有：陈友三、陶春、高容、张守谋、赵怀谦、肖文、张万厚、蔡桂发、王佩元、刘仁、郭致福、邢端、高凤鸣共十三人。常委会推选陈友三连任主任委员，张守谋、高容连选连任副主任委员，新选商业局局长陶春任副主任委员。杨润仍任秘书。同年六月二十日县人民委员会通知陈友三到工商联任驻会主任。此时工商联实有干部七人，到一九六四年仅有干部四人。

一九五三年六月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正式建立，（以下简称工商联）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共有十三年的历史，改选换届四次。十三年来，在县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在上级工商联和县统战部的具体指导下，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主义的工作，切实发挥了人民团体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工商联协助党和政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团结、教育广大私营工商业者逐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企业改造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推动全县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挥经营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专长，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方面，工商联也真正起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助手作用。现将这四届工商联的主要工作任务与作用简述如下：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企业改造：

一九五三年国家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改造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此期间，遵照《工商联的组织通则》除继续做好以前工商联联合会的各项工作和完成各项任务外，又增填了不少新的工作任务，主要有：

推动和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时事政策，以导致私营企业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学习一开始工商联就建立了学委会，制订了学

习计划，组织工商联委员，各同业公会主任和工商界上层共八十三人，分四个中心学习小组，每天到会学习两个小时，而后逐渐扩展到同业公会委员和企业的经副理，共计三百一十二人，编为十四个学习小组，以行业分片在企业学习，（自学和写发言提纲）每周到会讨论或辅导一次，不少人学习劲头很大，对学习较为认真。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使大多数人扭转了过去认为私营企业没前途，消极经营，急于卸掉帽子，逃避改造等错误思想，认识到接受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明确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进行思想改造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政策，利用限制是对积极与消极而言，改造是为了目前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必须先从学习中得到思想改造，把所学心得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以促进企业的改造。在学习中特别还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许多人通过税收和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表示出拥护的态度。工商界认购公债数字比较大，一九五五年以前每年认购数均达到五万元以上（新人民币）五五年上半年各行业在经营情况欠佳的情况下，还认购了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一元（新人民币）。工商联每年督促均能如数完成公债入库任务。在一九五三年学习反偷漏税收中，工商联启发动员和推动各行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县工商业者认识到偷漏国税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而达到了认真检查，如实补报。全县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户数报出大小不同的偷漏税行为。经税局核定，补交税款的共有三百八十六户，共补交各种税款三亿七千六百九十八万余元（旧人民币）。通过这次学习教育，对爱国纳税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五五年税局执行集体纳税按时入库的规定，在五五年二月税收入库时，座商中仅有饮食业巨香楼一户凑交不起税款，要求拖欠，这将影响全城座商完成入库任务。这时工商联领导骨干赵怀谦同志主动提出：为完成集体入库任务他带头为巨香楼垫款，促使座商一次交清了税款，受到税局好评。在一次工商业户大会上，税局领导对赵怀谦

同志进行了表彰。为此，工商联成立评议税务研究委员会时，公推赵怀谦同志担任了委员会主任。

工商联推动工商业户建立健全帐目，除经常进行督促检查外，于五四年还与税局协同培训了两期会计学习班，主要在中小户中，每期参加六十余人培训一个月的时间。

工商联在领导工商业者学习中，还培养扩大了骨干分子队伍，这些骨干一直是积极热忱地帮助工商联做好各项工作，并在各自的行业中，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在本行业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积极带头和桥梁作用。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工商业户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业务辅导：一九五三年九月工商联全体干部出动配合县总工会，对手工业进行了区分工作。这项工作开始到结束共用三个月余的时间。工商联干部分赴各手工行业除调查掌握真实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外，对手工业主认真进行了思想教育。工商联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充分协商研究，在搞通思想的基础上，逐户通过，最后取得一致满意，达到了劳资团结。区分以后，手工业主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有些户还增加了资金、添雇了学徒。工商联帮助和推动了各手工业户订出生产计划，提高生产，改进技术，在重点行业中专门辅导其发展，定期召开技术交流座谈会，达到改进生产，并帮助订立加工订货和购进原料的合同，导致手工业逐步发展，走向集体合作社、组的道路。

进入一九五八年以来，是加速对私营工商业的双重改造时期（双重改造是指企业和人的改造），首先进行了对商业的普查工作，工商联委员和干部都参与了此项工作，并发动各同业委员会协助摸清了底数，计算出各家商户所需维持保本的营业额。工商联召开大会和组织小型座谈会，协助党和政府对城、隆两镇如期完成了商业普查中和普查后的各项工作任务。与此同时，在一些经营统购统销原料的行业中，因原料供应不足，有些商户要求

转，歇业，工商联积极帮助一些户转入运输等业外，还及时向党和政府反映，经政府调查了解，很快地给予解决，如皮毛业多供应皮张和羊毛，粮、油加工亦给增加了原料加工数量。并对面食、酿造、饮食等八个用粮行业，共七十五户的用粮、面标准重行作了调整。由于这几个行业纷纷反映供应数量不合理，肥瘦不均。工商联经过逐户访问，用算细帐的办法，在原有供应数量的基础上，和粮食公司协商作了适当调整，使这些行业的供应数量达到平衡合理，消除了偏高偏低现象，使大多数工商业户维持了生产经营。

在此期间，工商联认真组织广大工商业者加强了学习，通过学习深刻领会了党的方针、政策，促进私营企业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户实现了经销、代销、兼销和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一九五五年蛋厂合营时，工商联领导骨干均参加了合营工作组，协助党和政府在同年七月顺利地完成了益兴诚蛋厂的公私合营任务。在蛋厂的典型示范合营之后，紧接着县委私改办又组织了私改大军。工商联干部都参与了私改工作，工商联委员和同业委员会主任，组成了公私合营委员会。工商联多次召集了工商界上层人士和骨干分子会议，反复贯彻党的和平改造政策。对部分较大的工商业户经、副理，工商联组织了训练班，进行思想发动，打消各种顾虑，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训练班从元月十日到二十一日共学习讨论了十二个晚上的时间。在每天的学习讨论中工商联领导陈友三、赵怀谦、赵子亮三同志都要到各小组听讨论，讲解党的政策。特别是陈友三、赵子亮、马振才、赵怀谦等同志在一次大会讨论结束时他们向与会人员号召说：“我们一定要对的起党和政府对我们多年来的政治思想教育，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大家在合营中要经得起考验，保证不抽

逃资金，不欺骗国家”。他们还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把所有的浮存、公债等一并投入合营企业，增加资金。由于工商界领导、骨干们的表率作用，从而带动了大家，在合营高潮中纷纷提出增投资金，有二百一十二户，三百一十人共报出增投资金，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九元，房屋四百余间。经过清产核资，核实个人入股时确保生活资料的和自住房屋给予退还。动员清退后统计增资还达四万多元。经过公私合营训练班对各工商业户经理副经理的深刻教育，提高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认识，因而很快在全体工商界中掀起了公私合营高潮。

在政府批准全行业合营申请后，就全面转入了清产核资工作，在清股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工商联开会发动起工商界人员，组织了清产核资大军，同时组织了有工商业者骨干分子参加的若干突击服务小组，与私改工作组，工人一道进入商户主动加班加点，他们白天营业，晚上清点，做到了清点营业生产两不误，很快解决了难度大的问题，仅用五天时间就基本结束了。

在人事安排时工商联召开了二次会议，充分研究了被安排人员的各种实际情况。并遵照党和政府及私改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了工商界提名，政府批准的办法。经工商联委员会和各同业公会酝酿本着量才使用 适当照顾的原则，提出了名单，经过协商决定后，报请政府批准。总之，在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联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

公私合营以后，私改工作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商联在县委私改领导小组和县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下，工作任务仍然是十分繁忙的。合营后，首先必须重新组织和调整商业网点工作，以便繁荣市场，便利群众，合理安排使用合营、合作企业中所有的从业人员，调动他们服务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各自的经营专长。这次

调整，在公私合营企业调整的有：

合营棉布总店一个，分大街设门市部六个，

合营百货、文具店一个，分大街设门市部六个，

合营食杂总店一个，分街道设门市二十四四个，

合营日杂总店一个，分街道设门市十一个，

合营服务总店一个，分街道设饮食门市部四个、照像门市三个、理发馆门市七个，澡堂门市一个。

合营印刷厂一个，设门市四个（包括焚化），

合营酿造厂一个，设门市八个（包括鲜菜），

合营糕点厂一个，设门市六个，

合营皮毛厂一个，分街道设门市作坊四个，

此外，还有合营厂家四个即：合营益兴诚蛋品厂、合营粮食加工厂、合营油脂加工厂、隆盛庄合营粮食加工厂。

以上总共公私合营厂、店十三个，下设门市网点八十四四个。

合作企业调整的有：

合作中心商店一个，分街市巷道下设门市网点一百零三个，

合作旅店，社二个，分街市巷道下设门市车马大店，旅馆二十七七个，

合作估衣商店一个，下设门市部六个，

合作面食小组一个，设门市部十五个，

合作饮食小组一个，设门市部六个，

合作烟酒小组一个，设门市部十四四个，

合作刻字小组一个，设门市部三个，

合作五金小组一个，设门市部十二个，

合作染坊一个，设作坊五个，

合作服务修理小组一个，设门市十个，

合作蔬菜摊小组一个，设摊点二十七七个，

合作石灰草炭小组一个，设点八个，

合作钉鞋小组一个，设门市点五个。

合作牛奶站一个。

总计合作组织单位十五个，下设门市网点二百四十一个。

在调整商业市场后，对所有从业人员，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量才使用，进行全面安排后，但各公私合营厂、店仍然还是人浮于事，为解决人员过剩问题，县委和政府向区内新建城市联系，输送出原工商业者一百九十四人，其中到包头的九十七人，到平地泉行政区各旗、县的七十五人；调剂到本县农村各供销社的二十二。输出人员总数中有合营企业在职的工商业者一百三十二人；有棉、百、粮、油、肉类、染业、行商等行业中的失业商人六十二人。这些人员在外调中思想问题异常复杂，工商联为此召开了数次会议和通过个别交谈，安定了情绪，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动员他们前往工作岗位上努力为社会服务。

通过统筹安排，使广大工商业者达到了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合营企业的营业额基本稳定，人员的工资有了保障，同时经过调整工资，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合营企业呈现出了新的气象。

一九五七年党和政府号召，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工商业者中，代表人物，骨干分子和其他大多数人，能够安心工作，并对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积极性很高，在本企业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参加竞赛，争做贡献。但发现有少数人对竞赛信心不高，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有的人还有抵触情绪。他们说：大城市合了营有办法，大企业合营好，小买卖合了营吃不开，没前途等等。有的嫌工资少，在工作上不积极主动，认为合了营有了胶皮饭碗，吃太平饭，思想跟不上形势。追其根源主要是：政治思想，立场、观点没有彻底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根深蒂固，对新社会认识不够，留恋旧社会，对资本主义老路恋恋不舍，业务观点不明，政治理论欠缺。为此，工商联

根据区工商联和当地党政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精神，举办了业余政治训练班和讲习班，每日分早晚两次学习四小时，参加学习的共有工商业者四百六十六人，开始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通过半年时间的学习，认识水平有所提高，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到党对工商业者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在大会、小组发言中，对过去私营时的剥削有了较正确的认识，通过讲事实，摆道理承认了过去的剥削行为，懂得了自己教育自己，从而业务观点普遍提高，基本上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步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为了使全体工商业者普遍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下半年将业余讲习班改为业余政治学校，校长陈友三、副校长赵怀谦、张宗义。学校制订了学习计划，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全联编写出版的《工商界政治常识课本》和党的八大文件。通过系统地学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工商联还举办了俱乐部、图书室，并出黑板报表扬各企业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与先进人物的先进事例：如表扬智足多谋发挥经营专长，棉布总店的张守谋；放手工作积极经营百货文具总店经理卢宗义；业务能手号称二孔明食杂总店的安定国；食杂总店还有三不悞的孔庆成、全包揽的王道德等人。通过出黑板报表扬，对学员启发作用很大，有的人看了说“人家也是工商业者，能做出先进事来，当模范，咱们不缺胳膊，不短腿为舍不能争取先进，丢掉落后”。

总之，一年来的业余政治学习，对广大业者团结、教育、改造成果显著，到年终评模时在工商业者中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就有六十二人。

一九五八年工商界中开展了全面整风，反右和交心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广大工商业者普遍得出了三不得的经验教训，即：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当不得。在交心运动中，即：（交黑心换红心）参加交心的工商业者共五百

一十二人，原订交心指标十二万六千九百条，最后交出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条，超交一万四千三百六十条。交心最多的七百三十条，最少的有三十条，一般均交三百条左右。运动结尾时，普遍承认了破资立社，必须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通过这次运动在工商界中又得出了新的三不得即：对党离不得、疑不得、假不得。经过一年多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全体工商业者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树立了社会主义责任感，广大工商业者普遍能够守职尽责，服务热情也大大提高，全面投入到了增产节约，大炼钢铁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他们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工作努力向前。如在抢种、秋收、积肥和植树下农村劳动中，均能报名参加，在各种劳动中竭尽全力，一次到官屯堡抢种山药时，工商联组织下乡劳动的工商业者共九十七人，其中有年过花甲的李兴春、杨泽贤、王道德、岳现珍等十六人，均能背上行李下乡参加劳动，每天都能出勤，早晚时间还给社员担水扫院，打扫街道，虽然劳动强度很重，但是从不叫苦叫累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好评。

为加速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工商联将合营时工商界家属、子女工作组，重新改建为工商界家属委员会，经大会选举，委员会由马秀英、郭秀贞、王翠兰、董仲莲、孔庆梅、艾文兰、周凤兰七人组成，委员会推选马秀英为主任，王翠兰为副主任。家属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参加工商联和街道组织的各项活动，深入工商界家中串门走访，教育她们勤俭持家，节约用粮、布，教育好子女，帮助爱人正确对待思想改造。

一九五八年工商联筹备举办工商界互助储金，五九年初正式成立工商界生活互助储金委员会。推选委员有：陈友三、王生明、郭致福、王佃元、邢端、刘仁、孙仰儒、胡英华、吴鸿勋、高容、杨润十一人组成。委员会推选陈友三为主任，郭致福、王生明二人为副主任。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坚持

积极稳妥、量力而行，本着收好、管好、用好的原则，坚决做到专款专用、补助适当，细水长流、善始善终。互助金的来源向所有工商业者及股东的定息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十；工商业者工资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一，两项款数每年可提取四千元左右，补助工商业者及遗属年支出三千余元。工商联另列专帐收支。每年受补助者达一百余人，若有临时困难者由会员基层组织向委员会申请借贷解决。以一九六四年为例，全年共收入四千三百九十七元，共支出六千零五十五元，支出中包括借款一千五百二十八元。全年受补助和借款人数达二百三十余人。

通过补助和借贷促进了部分工商业者安心工作，认真学习，接受教育改造。进行这项工作，虽补助标准不大，但也体现出党和组织对成员的温暖，所以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就停办了。“文革”前互助金帐目结存现金为五千五百九十六元六角三分。此款在储蓄所活期存放。“文革”开始被冻结停用。另有基层会员所在单位的借贷帐目一本，共借款一千五百二十八元二角三分。于一九八一年县委统战部向财政局联系提出现金二千元整，由赵怀谦主任主持，县委会计院林庆和统战杨润经办，在春节前如数补助了困难的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的遗属八十二人。下余三千五百九十六元六角三分，于一九八三年向财政局提出全部投资给卢宗义副主任所开办的玫桂香。

调 动 服 务

一九五九年工商联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推动全县工商界人士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和提供合理化建议工作。在召开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时，工商联的领导骨干陈友三、张守谋、赵怀谦、高容四位领导在大会上提出了倡议、保证，并提出了如下口号：

反掉右倾保守，鼓起革命干劲，政治思想挂帅，立即上马飞奔。代表带头冲锋，组长就是尖兵，为了社会主义，全部人马出

动。苦干实干巧干，不怕艰苦困难，革新建议一万，国庆元旦实现。学习政治理论、加强根本改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服务为先。擂起跃进战鼓，冲破技术难关，谁是英雄好汉，国庆元旦见面！

参加这次大会的工商界代表六十三人，代表们响应工商联领导同志的倡议、保证，在大会中他们本人就提出了发明、创造、革新、试制新产品和提供合理化建议共一千六百八十八条。在国庆节献礼的五百四十八条；在元旦节献礼的一千一百四十条。并表示会后回单位积极推动所有工商业者马上行动起来，积极发挥各自的才能。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工商联在开展技术“双革”和提供合理化建议上，做了大量工作，经常深入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与企业单位领导协商要支持重视工商业者提出的革新、建议，并推动和组织工商业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地改善经营管理，由于组织得力，因而在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消耗，克服浪费，修旧利废，增收节支，加速资金周转，减少流通环节，改进服务态度，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所以乌盟工商联办事处，在一九六一年召开全盟调动服务经验交流大会时，来丰镇县召开，并学习丰镇县工商界在技术“双革”提供合理化建议的经验和做出的先进事例。

一九五九年末，工商联为了利用基层做好各项工作，重新组建了所属会员的基层组织。共建立了会员小组四十二个。计有：

隆盛庄分会委员会由高容为主任，刘存怀为副主任，委员有：高风鸣、朱富才、吴通、孙儒泉、吕德七人组成。下设会员小组四个，分别由孙儒泉、朱富才、高风鸣、刘存怀四同志为会员小组组长。

棉、百货总店会员小组二个，由张守谋、孙仰儒为组长；

食杂总店会员小组四个，由郭致福、赵培珍、赵志孔、张连元为组长；

服务总店三个会员小组，由邢端、王文轩、郝文三同志为组长，

酿造厂会员小组二个，由白松煜、王生明二同志为组长，

糕点厂会员小组二个，由胡英华、刘连魁二同志为组长，

印刷厂会员小组二个，由白志全、刘文德二同志为组长，

皮毛厂会员小组二个，由刘仁、赵连二同志为组长，

蛋厂一个，由吴鸿勋为组长，

木器厂一个，由翟荣为组长，

鞋厂一个，由辛成章为组长，

被服厂一个，由吴生祥为组长，

机械厂一个，由张汉文为组长，

粮、油加工厂会员小组三个，由王佃元、胡培元、王明戌为组长，

工业品经理部会员小组一个，由贾培元同志为组长，

生产资料经理部一个由亢续凯同志为组长，

五金交化经理部一个由徐九善为组长，

煤建公司一个，由杨步华同志为组长，

蔬菜公司一个，由蔡桂发同志为组长，

食品公司一个，由刘建荣同志为组长，

医药公司一个，由杨培高同志为组长，

粮食公司一个，由赵珩同志为组长，

外贸公司一个，由马德润同志为组长，

房管会会员小组一个，由郭相为组长，

物资公司会员小组一个，由周成堂为组长，

副食品经理部一个，由谭世亮为组长，

牛奶站会员小组一个，由郭步星为组长。此外，中心合作商店会员总负责人有刘英、张尚义，还有联系人：苗隆、李三庆、张华等十余人。农村各供销社和分销店的会员联系人有：赵明洲、

安儒、马喜、金存义、王树国、梁佃奎、王为先、冯月芳等十余人。

加 强 改 造

一九六〇年以前工商界的加速自我改造，转变为加强改造。督促工商业者普遍制订了个人改造规划。工商联并建立了改造规划促进委员会，由十七人组成，张守谋为主任，赵怀谦、高容为副主任，委员有：陈友三、韦连升、杨润、于生泉、郭致福、郭步星、王佃元、赵玉顺、王生明、胡英华、段秀天、邢端、刘仁、刘良。

从六〇年到六四年，每年检查和修订自我改造规划一到两次。规划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政治思想的改造，就是转变立场、观点、方法，去腐生新；改造旧思想，去掉旧习惯和旧社会带来的一切肮脏东西；改造世界观和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本质。要求彻底清除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坏思想，达到破资、立新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

上级工商联提出工商界人员的改造已大有进步，但又指出还有问题，必需继续加强改造。于是在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将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改组。成立了丰镇县工商界政治学校，下设办公室。政治学校校务委员会有九人组成，校长刘玉堂，副校长陈友三，委员张守谋、高容、杨润、梁国英、赵培珍、刘仁、刘良。办公室主任杨润，工商联全体干部是学校的工作人员。

学校的学习方案规定：每期学习两个月，分四个单元上课，学习内容是：①伟大祖国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②社会发展规律，五种生产方式，结合学习李维汉部长编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③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结合进行三个主义教育，④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对工商界改造的方针、政策问题。政治学校是工商业者全脱产学习的正规学校，学员

食宿在校，除节假日和星期外，一律不准学员请假回家。县办的政治学校从六〇年十二月份开始到六二年，共举办了五期，每期抽调参加的学员七十到八十人，共计参加脱产学习的工商业者三百六十八人。选送赴内蒙社会主义学院和乌盟政治学校学习的工商界上层和骨干分子一百五十八人。总计脱产轮训了工商业者五百二十六人，除老弱病残外，全体工商业者普遍参加了脱产学习。

党和政府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的是“双重”改造，把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如果只搞企业改造，不搞人的思想改造就不相适应了，和平改造就不会搞好，所以人的思想改造是很重要的。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工商业者问题”一节中，他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周恩来总理写的一篇文章，所倡导的学习、改造叫《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文章中周恩来总理也恳切地谈到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改造。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革命老前辈的教导下，从一九五六年合营以来，到一九六五年工商界在加强学习、谈个人的思想改造方面，整整进行了十年之久。工商联推动和组织、团结、教育工商界人员，长期进行加强学习和自我改造，是正确的，也是健康的，学习、改造本来就有收获、有成绩的，出现过许多好人好事和先进事例，足以说明学习、改造是件好事。但在学习、改造问题上也有失误的地方，有过“左”的偏向，主要是我们的某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他们片面理解学习、改造。认为学习、改造是专门对工商业者的，工商业者就是被改造的对象。在某种场合下，把自己摆在改造人的位置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只谈改造别人，不谈自己也是学习、改造中的一员。另外，由于社会上的一些人对工商界的自

我教育，自我改造认识不够，观点不明，有许多不正确的言论，再加上少数工商业者的悲观情绪和错误的想法，因而在某个时期，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对学习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出现了厌倦改造情绪。认为自己成了改造对象，觉得自己真倒霉，真不光彩，被改造上个没完、没了。总之，通过学习收获是大的，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是难免的。

协助企业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政策

一九五九年以来，根据上级工商联的指示精神，在当地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下，在全县工商界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不变”政策。即：①政治安排不变；②学职学衔不变；③高薪工资不变；④定息五厘、七年不变，拿不拿听便；⑤改造政策不变。

一九五九年以后，为了缓和近年来工商界参加各种运动的紧张局势，上级领导指示在工商界中不论举办任何活动，都要采取“神仙会”的方式进行。工商联在工商界中认真贯彻执行了这项措施。从六〇年到六四年工商联开展的各项活动，都采取了“神仙会”的方式。召开“神仙会”的目的是让与会者消除紧张打消顾虑，也就是让他们在思想上松弛下来，和风细雨地开会。领导动员开“神仙会”的口号即是：神仙聚会，消遥自在，无拘无束，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各舒己见。召开大型会议进行的方法是：听听，看看、想想、谈谈。即：听是听党政领导的报告；看是参观国家的建设事业；想是想想自己过去的看法和认识；谈是在大小会讨论中发表个人内心的见解，也就是本着“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工商联在召开会议和各项活动中，还必须认真贯彻“三不”政策，“五不原则”。

根据上级工商联的指示，在此期间，向全县工商界及其所在企业，认真推行了全联提出的“三以”措施，即：以政治思想为

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企业改造为基地。

贯彻党的“赎买”政策，一九六一年中央提出，全国工商业者要“顾一头，一边倒”国家要“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中央的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员要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倒向共产党这一边；国家要把工商界人员的工作、生活包下来，一包到底。即：不精简，不下放，有了病，请个假，工资照发。

一九六〇年九月对工商界的十名右派，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的现实表现，摘掉了吴鸿勋、樊耀忠二人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一年十月在红砂坝右派集训后又给焦树祥摘掉了右派帽子其余七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并将十名错划右派完全改正过来，恢复了工作和工资级别，对一些在生活上困难的给予合理补助，有的给办理了退休。

一九六二年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在公私合营时，参加的工商业者，年龄在六十岁以上（包括六十岁）均可办理退休；病残者可以请长假。根据这一政策精神，工商联与各企业公、私双方代表协商研究后，经动员和督促，工商业者写了申请退休书，一次就批准了一百二十一名年老的工商业者退了休；批准十四名病残工商业者请了长假。与此同时对合作中心商店年迈的五十四名的小商贩，也动员他们回家休养，并按月给予了生活费。

一九六三年根据区联和当地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丰镇县工商联成立了下设的小商联。小商联的工作任务，是对所有的合作组织和挂名的合作小组以及自营的小商、小贩，一律归小商联领导和教育。小商联的办公地址设在合作中心商店。由工商联干部陈冠庭同志负责。

协调公私共事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公私合营以后，把合营过来的工商业者，统称为“私方人员”。有的企业单位领导对工商业者（私方人员）的看法不那么

正确。个别领导对工商业者所在工作上甚至刁难。如工商联的老主任陈友三被安排到医药公司任副经理，确是有职无权，大小事也不能主张。工商联只好代替陈向党委统战部反映。经县委领导研究决定：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将陈调回工商联任驻会主任。粮食加工厂王佃元（是工商联的老常委）合营后被安排为该厂的正厂长。王在工商联开会时提出：私方人员不管用，根本主不了事，只能领导工商业者的学习，其他方面有职无权，比如我是厂里的厂长，不但说出话来人家（指公方副厂长）不听，就是在其他方面行使职权也行不通的。如向银行开户也是使用人家副厂长的图章，把正厂长搁在一边坐冷板凳。郝文在合营后被安排在国营食堂任经理，他在工商联哭诉说：我这个经理什么事也主不了，而是业务人员主事，人家说了算。我只好当个牌位子。以上几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在公私共事关系上是有问题的。其次有极少数工商业者在生活作风和其他方面犯有错误，有的单位主张开除，有的要加重处理，工商联经调查了解后，主动与单位研究协商均能按党的政策规定，给予恰当处理。为此，工商界人员都说：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娘家，所以有事都能主动地到工商联反映。

推动工商业者和企业单位，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是调动工商业者积极服务、发挥专长，搞好企业的关键所在。因而工商联积极与统战部商讨，并取得支持，联合召开了数次企业公、私双方代表有关公私共事关系座谈会，基本上消除了公私共事关系的紧张局面，使工商业者们感到有党的支持能够有职有权地工作。从而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如郝文经理在经营管理上，发挥出才能，在三年困难时期创造出许多粗粮细做的食品花样，还积极主动地发明试制成功了馒头机、饺子机，受到了本系统，本单位领导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好评。

“文革”中的动乱

解放以后，工商联的工作，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私营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遵循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又长期进行了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工作，并且不停地大力推动工商界成员发挥生产技术才能和经营管理的专长与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各个时期，工商联对所属成员，一贯从事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抓紧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在长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中，协助党和政府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已将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改造达到了“化过来，消灭掉”的目的。这对党、对人民和对原来的工商业者都是非常有利的。近二十年的工作是有成绩，有贡献的。（当然某些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过“左”的偏向，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之类强加在工商联及其成员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给工商界人员造成的冤、假、错案有许多、许多。

“文革”初期，由于打砸抢分子的横冲直闯，工商联的财产、实物均不由自主了，有的拉走了人力平车，有的骑走了自行车，有的拿走了10w喇叭和麦克风及各种电器等等。特别是房产竟被群专、工代会、红代会及各种战斗队所抢占。工商联帐簿记载，共有六十一间房子（其中有瓦房四十七间，土房十四间，包括隆盛庄分会的瓦房十九间），这些房子除本会和政协的办公室，大小会议室及库房外，其余是原同业委员会轮流学习所用的房子。后来县总工会利用这座里外大院及拆除下的建筑材料盖起了大楼。

工商联的其他财产，实物很多，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间照帐清点了几天，均交与当地财政局收管。移交人：杨润、接交人：王学炳。（清点实物财产手续，一式三份，十二页，给移交人--

份一直保存在新工商联恢复后交新会存档。

工商联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八年，历年来所有的档案资料、书籍和各种财务帐簿、记帐凭据及保存卷柜等物，在同年十月也尽数移交县档案馆了。整理移交人杨润，接授人档案馆马珍，移交清单尚保存，在恢复新工商联后，交新会存档。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使工商联停止了活动，广大工商界人士普遍遭受了迫害和打击，有的竟含冤死去。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由县委统战部牵头，调查、督促工商业者所在企业单位逐渐平反落实了政策。使广大工商界人士又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工商界成员们感到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从而纷纷表示要报国出力。他们强烈地报国热情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变成了决心为四化服务的具体行动。十余年来尽管工商联组织没有恢复，但在县委、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工商界成员积极与统战部门配合做了不少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县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为恢复工商联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恢复、建立工商联组织

一九八四年底，内蒙古党委办公厅批转了关于恢复部分旗县工商联组织的一百三十一号文件。县委统战部根据文件精神，于八五年初向县委写了恢复工商联的请示报告。县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常委会议讨论，会议一致认为这几年工商界成员所搞的待业青年网点工作很好，不仅具备了恢复工商联组织的条件，而且对今后发展经济，振兴丰镇也十分必要，很快批准了统战部的报告。于五月初开始进行了召开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专门研究了工商联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并请示批准了筹建费和会议费等

等。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到十三日召开了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六十三人，其中有原老工商界代表三十六人，“文革”前的工商联老委员，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并特邀工商界家属，子女三人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期间，县委的主要领导人亲临指导并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使与会代表深受感动。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新的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由十七名同志组成（其中工商界人士九名）。他们是：赵怀谦、庞有、王善金、滕发亮、连一、邢元志、张守谋、卢宗义、贾培元、杨培高、田福、宋成旺、刘太增、刘诚、白松煜、高容、石杰。接着，执委会又选举了主任、副主任，选举结果：赵怀谦同志选为主任委员，庞有同志选为副主任委员。

这次大会，由于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大会的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从而把被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浩劫中搞垮了的组织，又重新恢复、建立起来，新的领导班子在为四化建设的政治舞台上又重新活跃起来，同时开展了各项工作。在大会结束时，向代表们布置了任务。代表们回到各自的企业后，召集所属成员传达了赵怀谦主任在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和庞有副主任的开幕讲话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通过广泛传达，使所有工商界成员对新时期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及会员的构成有了明确的了解，对工商联在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改变了他们过去对恢复工商联组织的说法：“五十年代作用大，六十年代砸垮啦，七十年代没有啦，八十年代又恢复，恢复了也没事干啦”等错误认识。

发展新会员 登记老会员

根据全国工商联一九八五年八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在当前多种形式的经济体制并存的新形势下，工商联原有会员老化，会员构成与客观要求已不相适应。为了更好地完成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赋予的新的历史任务。工商联恢复不久，在同年的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会同县委统战部与区、盟党委统战部和区、盟工商联发展了新的会员。发展了企业会员三十人，团体会员一人、个人会员五十四人。新会员中有工商界子女八人，妇女十人，有助理会计师二人，技术员二人，有厂长，经理十三人，个体户二十二。按人所在单位的性质分，从国营企业中发展了个人会员十五人，从集体工厂和乡镇企业中发展了十七人，从个体户中吸收了二十二。新发展的会员中有中共党员七人，少数民族二人。平均年龄为三十七点七岁。

在发展新会员中，对老会员又深入单位或到其家中，进行了登记，先后共登记老会员二百五十一人，占应登记三百三十二人老会员的百分之七十五、六。

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第五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增补了尉致卫、王瑞、陈桂珍（女）三同志为执行委员。在原有一名主委、一名付主委的基础上，为符合会章要求，使工商联工作便于开展，增选了张守谋、尉致卫、卢宗义三同志为副主任委员。并商讨决定张守谋同志为驻会副主任负责咨询，培训工作；卢宗义副主任专搞工商联所办的经济实体工作，尉致卫副主任是兼职。这样就使工商联组织加强了领导力量，增添了新鲜血液。在机构设置上，经县委批准，工商联内部设立了两部一室（组织宣传部、咨询培训部、办公室），并以陈桂珍委员为主建立了妇女工作小组。增加了人员编制，为今后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一九八六年九月，恢复了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隆盛庄分会。选举王瑞为分会主任、李英、张宏智为分会副主任。

积极创办经济实体 大力安排待业青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老工商界人士的心情确实舒畅了。他们不因自己年事已高，坐在家里享清福，而是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报国之志，大胆开拓，勇于创新，大力开办集体经济，安排城镇待业青年。八十年代初县里的待业青年很多，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的职工处于饱和状态，根本无法接受待业青年，除部分个体户自谋职业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无法安排，这是当地政府难以解决的一件大事。

原工商界已退休的老同志想党之所想，急群众所急，欣然接受本单位和外单位的聘请。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精神，凭他们经商多年，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业务专长，凭他们的事业心强，信誉又好，精打细算，善于把生意做活的优势，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因陋就简，拾遗补缺，创办了各种类型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设立了青年网点。先后共安排待业青年六百余人。

这些老工商界的同志们，不仅能够兢兢业业的做好生意，还肯花力气培训就业青年。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对青年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培养青年掌握商品知识，传授柜台技术，让他们熟悉各种业务，做到了老工商业者愿意传、帮、带，小青年们勤于接、学、干。这几年来绝大多数青年普遍提高了业务技术水平，并能安心工作，忠于职守，服务态度和蔼，热爱集体事业。这样不仅使国家税收和企业积累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在社会效益上，也对活跃市场，便利群众等方面均起到了好的作用。

老工商界成员兴办的集体经济，大多数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的。一九八三年原工商联五十年代的副主任芦宗

义同志，开始创办的“玫瑰香”糕点厂，就是在一无资金，二无厂坊同时又是一无工资，二无补贴的情况下招聘糕点师傅和待业青年们搞起来的。当时仅有资金是原工商界生活互助金三千六百九十六元七角三分。经领导同意借给了他们。芦宗义同志精打细算，用这些钱除了买一些必要的设备和油、糖、面原料外，其余都是靠东拼西凑，连借带租来解决的。几年来芦副主委搞的经实实体，逐渐扩大。县工商联恢复后，又有新的较大发展。

县工商联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工商联办企业的暂行规定》精神，征的领导部门和各有关方面意见一致同意后，于一九八六年经会议决定：把在政协和统战部牵头帮助下芦副主委搞起来的振兴贸易公司和下属的七个门市部收归为工商联办企业的经济实体。公司和各门市部统一挂上了丰镇县工商业联合会振兴公司和某某门市部的牌子。现在振兴公司除批发部外，下属还有棉布、百货、土产、糖业烟酒、糕点副食、干鲜果品、京津酱菜，共七个门市部。共有从业职工一百一十五人，其中有安排的待业青年七十三人，聘请的老工商界成员和其他必要人员四十二人。实有资金（集资）二十多万元多。累计上缴国税十余万元。积累纯利润十余万元。八七年完成营业额三百二十万元，八八年完成营业额三百六十万元。

一九八六年隆盛庄分会，以分会主任王瑞牵头，创办了工商联的经济实体——振华经营部一处，现在已发展了五个门市网点，主要经营糖业烟酒、副食糕点、百杂货等，今年还开办了一个炸油作坊。共有从业职工二十四人，其中安排待业青年十七人。振华经营部虽然兴办时间不长，范围不大，但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工商联办企业为什么能够不断扩大发展呢？除了老工商界成员，发挥优势，以身作则，精心经营以外，最重要的一条是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教技术提高业务水平，帮思想，安心热爱本职工作，端正服务态度。还有一套对

青年的组织管理制度。使企业兴旺发达，越搞越活，越办越大。

丰镇县当前工商各业的基本状况

在一九八二年，县委统战部对老工商界成员区别时，一九五六年全县参加公私合营的原工商业者（包括“三小”）共计六百九十六人。到一九八七年末统计，现在职的仅有十四人，已办理退休的有二百七十七人，死亡了的却有四百零五人。在职加退休的老工商界会员共有二百九十一人，再加上新发展的会员，现在工商联实有新老会员三百四十五人。健在的老会员年龄是，八十岁以上的有二十一人；七十一岁至八十岁的有九十三人；六十一岁至七十岁的有一百六十三人；六十岁以下的有二十九人。

老会员退休后，被本单位留用的有三十六人；参加工商联办企业的有十九人；被外单位招聘的有二十四人；在家搞小生意、小手工业的有四十九人。合计：老会员继续工作、劳动的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余一百八十九人在家安度晚年和搞家务。他们在退休以后，都与本企业单位的职工享受着同等待遇。现在老工商界成员的子女绝大多数人都在丰镇县各企事业单位工作，有些人还是单位的领导成员。

以上可以看出丰镇县的老工商界的人员已为数不多了，而且确实业已年迈了。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看，丰镇县的工商各业逐渐发展了，现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生产，在解放初期小手工业的基础上，现已发展成为全盟的第二个工业城镇，商业和其他经济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国、合企业六百一十三个，职工有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八人。

个体工商业户已发展到三千六百五十五户，（其中工业、手工业四百五十一户，商业二千四百三十六户、饮食服务业三百一十六户，运输业二百零八户，修理业二百零四户，房屋修缮业四十

千户。个体户的从业人员有四千七百五十人，资金总额二亿零三九百五十六元。

从丰镇县工商联目前的会员情况看，一是老，二是少。但从新发展起来的工商各业及个体工商业户看，是如此之壮观。在新形势下，工商联根据可能，应积极探索，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新人，开展吸收新会员工作。使我县的工商业逐步走向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辉煌前程。

注：

一九五四年五月以前统计资金均系旧人民币。

丰镇议会选举始末

山西省咨议局议员选举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预备仿行宪政，丰镇厅署奉命筹备选举山西省咨议局议员。选民按规定须年满二十岁以上，被选举人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均在选举区内居住两年以上，年纳直接税两元以上，考取附生以上或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为合格。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七月，厅署举行初选，经归绥道复选，丰镇厅的宋杰、李苑林、秦甚都、栗名儒被选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

议会议员选举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丰镇县署奉山西省议会筹备选举事务所指令，以县知事为初选区监督，成立了县选举事务所，依省议会选举法，选民应为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二十岁以上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年纳直接税两元以上者；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或与小学毕业相当资格者。经调查，全县具有选民资格者3113名。县选举事务所举行初举，选出五名为议员初选当选人。一九一三年十月赴归绥道复选。同时，丰镇县筹办了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一九一三年九月，归绥道选举丰镇县的温廷相为国会众议院候补议员，一九一三年十月，山西省议会推选丰镇县的班廷献为国会参议院议员。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四月，丰镇县知事公署奉命改组自

治事务所，成立了县临时议会。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一月，丰镇县议会成立。一九一六年撤销议会。

一九一八年八月，丰镇县初选顺直省第二届议会议员，当选人为三十五名，经绥远特别行政区复选，丰镇县的段士英以察哈尔特别行政区议员参加顺直省议会。同时，丰镇县宋弼良被选为第二届国会参议院议员。

一九二一年七月，丰镇县初选顺直省第三届议会议员，当选人为三十名。八月，绥远道尹公署复选，丰镇县张文焘被选为顺直省议会议员。

一九二四年，温廷相递补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丰镇县政府根据县参议会选举条例，成立了县选举事务所。所选举事务所派员分赴各乡、镇及职业团体监选县参议会议员，经各乡、镇的乡民代表会议和职业团体代表会选举，全县共选举出县参议员二十四名，其中各乡镇十八名，教育会两名、农会两名、商会一名、总工会一名。

三月二十六日，丰镇县召开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按照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规定，选举了议长、副议长，组成了丰镇县参议会。

议 长	袁 鎰			
副议长	王国宾			
参议员	司廷阁	王鼎臣	张述先	侯镇国
	蔚日升	张 铎	赵崇瑞	赵登羸
	吉中浮	寿廷忠	师 义	寿化五
	王敬亭	王 兴	贤 群	李世荣
	宋广恒	张万仁	梁世英	段 礼
	郝 玉	蒿 宣		

国大代表选举

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丰镇县政府奉绥远省选举事务所电令。成立了县选举事务所，筹办国大代表选举事宜。按规定以区域、职业团体、回民分别选举，选民须年满二十岁以上，被选举人亦须二十三岁以上者。全县按区域登记选民为156516名，职业团体选民为2759名，回民选民为713名。县选举事务所提名张华、袁镒、张淑良、王毓士、张恺然、安吉人、王国宾、乔学曾为丰镇县国大代表候选人。全县以行政区域设置了18个选举投票所。职业团体和回民各设置了一个选举投票所。各投票所均由投票管理员和监督员办理投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县府大厅举行开票仪式。经计票，张淑良当选为国大代表，袁镒为国大代表候补第一、王国宾为候补第二、安吉人为候补第三，回民选举吴相为国大代表，职业团体选举乔学曾为国大代表。

师学温烈士传略

一九四一年春，塞北的蛮汉山区，天气格外寒冷，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岁月。在卓资山的旗下营镇，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保护蒙古族同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就是绥东工委委员、兴丰县委书记师学温同志。

师学温原名师进生，曾用名师学文、化名张文广。一九〇九年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师家园则村一个农民家庭。清涧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

一九二六年二月，学温在清涧第一高小读书时由师延兴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月，由师应三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党支部宣传、组织干事，清涧城关区委书记等职务。同年，学温由白自强介绍加入县农民协会、曾任农民部长、发动和领导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五月，因叛徒出卖，清涧城关区委遭到敌人破坏，区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同时被敌枪杀。在城外的师学温闻讯后，只身跑到山西石楼等地，与组织联系中断了。一九三六年春，中央红军东征到山西时，学温经刘玉财、任海宽介绍重新入党。同年秋，他由三边特委介绍在子丹县中央党校受训六个月。受训期间，由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亲笔写了审查材料，将他这段历史以犯有错误作了结论。

一九三七年初，师学温被分配到伊克昭盟从事地下工作，任乌审工委常委兼秘书。一九三八年七月由伊盟返回陕甘宁边区。

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敌占区，开辟了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十一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决定成立绥远省委白如冰同志任省委书记。一九三九年二月，师学温等一批干部随白如冰、白成铭等同志来到大青山。三月，绥远省委在大青山成立。五月，省委组织部长兼绥东工委书记白成铭率师学温等一批干部进入蛮汉山区，在蛮汉山乔郭天村正式成立了绥东工委，学温任工委委员、组织上先派他深入敌占区，搜集敌人情报。他经常化装出入于卓资山等集镇，秘密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为部队提供情报。后负责开辟丰东抗日游击区。

丰东，即丰镇东部山区，今大庄科、官屯堡、浑源天、黑土台、对九沟一带。日寇侵占丰镇后，沦为敌占区。该地区山高坡陡，峡谷纵横，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连接地带，战略位置很重要。建立丰东抗日根据地，似一把尖刀刺向敌人心脏，既可以牵制大同，孤山及长城边各敌据点的敌人兵力，减轻敌对我蛮汉山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又可以连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为开辟以采凉山、盘羊山为中心的丰东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警备六团、雁北六支队、大青山支队一营和五分区的一个骑兵营，在张达志的统一指挥下进军丰东，开辟了丰东抗日根据地，大部队转移后，初秋，一营（邹凤山支队）派出罗重群为主任的工作团，带领一班战士又进入丰东地区。为巩固丰东根据地，组织上又派师学温等同志赴丰东组建丰东工委，师学温任工委书记，罗重群、甄则西任工委委员。

当时的丰东地区，大部队撤走以后，日伪势力更加猖狂。黑土台、元山子、大庄科、官屯堡等地都有敌人的据点。沿长城边上的镇川堡、镇川口、镇边堡、镇宏堡也都有敌人的据点。驻扎在大同、孤山的日寇经常进入丰东地区“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同时，活动在丰东的土匪多如牛毛，有三、五一伙四处流窜的，也有盘据在丰东的数百人一伙的政治土匪，他们有的与敌伪勾勾搭搭，有的干脆投靠日寇，变成伪军，四处残害百姓，

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为了发动群众，工委决定首先建立武装，剿匪除霸。在罗重群带来的一个班的基础上，迅速组建了一支四十多人游击队，开展剿匪和镇压汉奸恶霸的斗争。短短的几个月，小股土匪基本被肃清，大股土匪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百姓了。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游击队，初战告捷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丰东工委改称兴丰县委，同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兴丰县政府，师学温任县委书记，委员有：罗重群、甄则西、杨文江、杨宝山。罗重群任县长兼武装部长，甄则西任组织部长，杨文江任宣传部长。一九三九年冬天，在丰东大西坡村，师学温主持召开了县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同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战。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一些上层人士，建立了一批对敌应酬，为我服务的两面村政权。

镇川口民团团长吕××，副团长张××都是知识分子，虽出身豪门，但有爱国之心，不愿做亡国奴。经我多次做工作，二人终于表示，愿与我游击队密切联系，共同抗日。这个日寇的据点逐渐变成了我们游击队的据点，游击队的粮食、布匹、钱物都藏存在这里，游击队的伤病员也常在据点内隐蔽治疗。民团还与我们的游击队配合奇袭孟家营，消灭了大股土匪。后因伪乡长告密，吕、张二人被捕，日寇严刑拷打，他们表现的很有气节，始终没有暴露我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据点内的游击队钱物。后二人在大同被日寇杀害。

学温亲自到一家姓张的地主家做工作，使他家成了我们工作的联络点和地下工作人员的隐蔽点，经常隐蔽我党的同志。

学温还十分重视发展党的组织和培养新干部的成长，他亲自选拔护送青年干部到延安学习，李丰同志就是由他护送到旗下营镇，后转延安学习的青年干部之一。短短地时间，就培养了一批当地干部，为革命增加了有生力量。

经过学温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以采凉山、盘羊山为中心的西起三村梁，东至盘羊山、平顶山、南抵长城，北达官屯堡的丰东抗日游击区终于建立和巩固起来。丰东地区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极大恐慌。一九四〇年冬天，日寇的“扫荡”日趋频繁，丰东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绥察区党委和大青山骑兵支队决定兴丰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撤离丰东，转移到了蛮汉山。

师学温等同志撤离丰东后，转移到卓资山一带，隐蔽在蒙古族牧民乌里吉胡图家中，受命组建绥南地委。他时而化装成铁匠，时而化装成长工，还经常以钉鞋匠的身份出入于平绥铁路沿线的集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侦察铁路沿线日军活动情况。为了便于地下工作他们在白银厂汉开设了粮店，由乌里吉胡图挂名经理，师学温、杨宝山以店员为掩护，秘密活动于广大山区和铁路沿线。学温还通过乌里吉胡图结识了察哈尔镶兰旗总管，该总管还为他出具了通行证，便利了地下工作。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来到了，学温为组建绥南地委已奔波近二个月。他的秘密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被敌人以嫌疑犯逮捕，遭到严刑拷打，他知道敌人并没有发现他的身份，誓死不肯承认是共产党。组织上又通过各种关系营救他，敌人无奈，只得将他释放。获释后他又回到乌里吉胡图家养伤，一天敌人又来到乌里吉胡图家，用酷刑毒打乌里吉胡图，让他说出谁是共产党，乌里吉胡图誓死如归，矢口否认他家藏过共产党，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这位蒙古同胞准备牺牲自己，保护汉族兄弟。学温看到蒙族兄弟惨遭毒打，心如刀绞，为了保护蒙族同胞和其它同志的安全，为了党的事业，他毅然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英勇被捕，牺牲在旗下营，时年三十二岁。

一九四一年三月，绥南地委在和林南山建立，领导绥南人民

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卓越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人民没有忘记先烈。一九五八年，烈士遗女曾来内蒙，受到自治区组织部的亲切接待，内蒙民政局为其办理了烈士证明书。烈士当年的战友在往事的回忆里总要提到大个子、红脸膛，打仗很勇敢的县委书记师学温。

他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隆盛庄开发与经济兴衰

隆盛庄地区自清代始，属于太仆寺右翼马场，土地肥沃，水草丰盛。

乾隆年间，由于北方畜牧业的发展，内蒙地区和甘肃、陕西一带的牲畜需要运往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出售，因当时无铁路运输，只得起早走（步行走），隆盛庄地区是旱路必经之地，由于水草丰盛，两条清彻的河水环绕而过，牛、马、羊群便在此地歇脚和过夜食宿。于是，帐篷相连，牛羊群遍野，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放牧者和羊贩子。与此同时，内蒙前山地区的农业也相应地有所开发，四子王旗、达茂旗、陶林（中旗）和兴和县西半部分地区的粮食需运往抚民府（丰镇）和大同，而中途必经隆盛庄地区，于是隆盛庄地区便成了交通的枢纽。直至乾隆三十年，正式批准开发这一地区，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开始放地。形式上是招商开垦，每放一号地为七顷半，定居点叫庄，也叫村、屯或号。

当时以晋北、晋中、忻州、崞县一带的人来抽签买地者为最多。隆盛庄便由三十号地相连接在一起，并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居民，形成了一个庄子，于是“隆盛庄”这个名称由抚民府（当时的丰镇）同知正式命名，（可能有乾隆盛世之意）。这时也产生和集聚了一部分小摊贩。从乾隆37年—52年，由摊贩集资和外来投资开始开设商号。以马店、粮店、油房、陆陈行（加工米面），铁匠、木匠、棉布、百货为主，十余年间就发展为百余家商号，也有了银店和小手工业，人口也急剧增长，这时人口已上万余，

于嘉庆年间已形成了小集镇的雏形。首先开创的是北街，继后是马桥街、南街。这时的经济已开始繁荣，每年仅经过这里转卖贩运的牧畜也较前增多，交易额仅以牧畜头数一项计算，羊近10万只，牛约3千头，马约5千匹。粮食的转运和销售也在增长，由于集市、贸易的繁荣，便在嘉庆年间修建了南庙，不久又修建了北庙。礼拜寺在乾隆末年初建于西门外，嘉庆年间改建在大北街，道光十年由陕西花县马阿勺等的友助才将礼拜寺修建在小北街（现礼拜寺）。咸丰六年慈禧太后代御笔书写了《清真寺》牌匾。

自乾隆末年出现的旅蒙业到嘉庆，道光年间便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通商的路途也非常边远，北至乌兰巴托、卡图，西到甘肃和宁夏北部，这一股经济力量发展壮大之快，因而在道光年间旅蒙业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力量，也是一项主要的开源商业。

到咸丰年间，隆盛庄的经济发展为清朝的极盛时期，大型的粮店有万义店等八家，陆陈行有德隆益等八家，棉布庄有聚义德等十家，铁匠炉、木匠铺有长胜炉等数家，马店（转运购售牛、马、羊群）有六合堂等八家，这时的贸易额也颇为可观，每年仅出售转运羊一项达五十万只左右。由于商号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便逐渐按行业组成了八大行：分为粮店、缸房、钱铺、当铺、货庄、陆陈行、皮毛、山货。当时由商界财主自己推荐的机构商务会。而后又由商务会去维护各商行，并摊派过往军队的费用和地方的各项大型费用等开支，如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和六月二十四的古庙会等社会活动，并维护庄内而遇到一些较大的困难或纠纷也由商务会出面维护和帮助。随后其它行业也各自结成了团社，当时有福隆社，兴隆社、集锦社、马王社、老君社、鲁班社、鲜菜社等，这些社，每年连续不断地请来戏班子唱戏，搞活集市贸易，吸引外地大批商客；有京津一带的羊客、马

客，有苏州、杭州的丝绸茶商，河南、山东的驴、骡客商，雁北地区的粮商等等。真是买卖繁荣，购销两旺。又有山西宁武地区运来大批良好的建筑木材，这使隆庄尽快地就建成一座繁华壮丽的塞外集镇——隆盛庄。当时也有小苏州之称。在数十年来不断地发展又由同治、光绪、宣统进入民国，而经济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民国初年到民国十年，这是隆盛庄在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也就是经济发展最殷实、最繁华的时期，人口已增长到两万多。全镇仅挂牌的商号即有三百余家，还有其它设在店内的作业坊，以及春夏到草地（内蒙北方）秋冬返回庄的蒙商，当时的贸易额也最大。钱铺（银行形式的）便有20余家，粮店10余家，马店十几家。以牲畜交易一项看当时的贸易状况：成交员（汉民）有400余人，回民交易员128人，年成交的羊近20万只，牛6千余头，马万余匹。当时马贩子也有十余家。除当地宰杀两万余只羊外，其余的羊群都远走京津一带，最远者运往汉口、广东。

所有经商者绝大多数为忻州、崞县、定襄人，少数有大同、天镇阳高人。忻、崞二县人多数经营粮食、钱行、绸缎、棉布、日杂百货业。定襄人经营蒙商居多。大同人经营小百货业、杂货业、手饰银楼业。天镇阳高人经营手工业、其他及少数人为河南人经营医药行业。

民国十年前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盛况，是由开源商业旅蒙商及旅蒙手工业者开拓，他们在春季将隆盛庄的米面、布匹、烟茶、油酒等百货运往蒙地和蒙民通商，由蒙地再对流回皮毛，牲畜及其它土特产品。旅蒙手工业者是铁木匠带着原料和工具前往草原为蒙民修制用具、家什、设备等以换得皮毛、牲畜。这一股经营贸易的收入来源为隆盛庄最大的主流，逐年如此，利润收入相当可观，为隆庄增加了大量的财源。但他们的日夜兼程的艰苦辛勤是值得效法的，他们的经营生活方式，只要今天一离家出

日，便是帐蓬居住，风餐露宿。运输工具只依靠牛板车，日行路程四、五十华里，牛带钝铃、夜行驶，商贩为了换取更便宜的牲畜和皮毛，他们最远前程有恰克图（卡图），乌兰巴托等地。他们只以勤俭生财，当时最大的草地庄字号有义合成、天合成、谦合成、万顺成，他们的组织为集锦社。

在庄商业网络中，其主要为钱铺、钱庄、银号。但大小不同，其内幕大同小异。如隆庄钱铺业其经理在承接某资本家投资后，即声称为某资本家事业，其实也会用若干现钞、银币或银两。遂选用金融惯手了解市场。将部分现钞，投放市场，另一手则向社会吸收游资，实行低利借入，高息放出，即可生息，随即运用各种经营技巧和手段掌握市场，形成金融网络，空来空去。这种来去的划拨兑付商名称为谱拨街市，如农民进城买粮，不见现款，即可到市场任何一家商店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由粮店拨款，粮店负责清偿，月终粮店将所有债务交给钱铺，由钱铺代粮店偿还，粮店负担部分利息，粮店如将粮食出售，也将债权交给钱铺，如粮食售到大同或京津一带，客商、买粮商不带现款，等粮发运到地头后，从地头付款，这样粮店再将款交给钱铺，钱铺便将款转放到绸布、百货业，到外地采购不用带款，这样周而复始空来空去，都各以信誉为本，随使市场繁荣兴旺，企业经济增长，日积月累，加之庄内人民一向勤俭为本，数年间便为殷实的经济体系打下稳实的基础，于是一些经济能手便视市场需要而开发各种事业。当时与后继开设的钱铺有茂恒永、义生源、德隆郁、庆春源、恒丰瑞、得辰公、同义长、源丰永等商号，他们的组织和粮店合称为宝粟社。

其次主要行业为粮店，他们的营利方式据理是代收代卖，赚得佣金，为双方买卖解决困难，实际上他们也囤积聚奇，投机倒把。在商业中他们不算殷实的行业，而在现象上看也最轰轰烈烈。在隆盛庄的粮店，每逢秋收后，他们即开始大量收售，尽管

代客买卖，从中抽取佣金。最普通的佣金为3%，即成交百元营业，可得佣金3元，依此类推，视一月，通年的营业计算盈余当然不在少量，进而囤积储存，低买高卖，以备外地客商来购，既有佣金可得且能赚得价码。更有甚者即牟取不法利润。进行投机倒把，空买空卖。因这种交易都在他们的操纵下进行，这就是后世人所说的虎盘生意，即：明盘、暗盘、季节盘、树稍盘，他们所经营的数量是相当大，过手的数字也大，但是他们在经营上离不了钱铺做后盾，这两种行业是相辅相成，而互相利用，相依为命的。当时的粮店有茂盛店、恒隆店、永太店、德元店、信合店、德生店、义丰店、丰裕店等数十家，他们的钱铺是联袂生意，所以他们的共同组织属一一宝粟社。

再次就是质当业，也称当铺，他们说的是救人之难，济人之急，但他们的剥削行为相当严重，所谓典当一半价，其价值一元，能当五角，年半不抽赎即行落号，不准抽赎，由当铺处理拍卖，获利不小。就平时抽赎也获利较大，当价一元月抽赎就得付息三分，两月抽赎付息六分，依此类推，贫民财物，越当得多，当铺获利越大。据闻在年景不景气时，每家当商可达20万当架，照三分息计算，每月就可得六千元收入，通年七万余元。他们的款项来源大都是吸收社会游资，年利不超八厘，即二十万元也不过一万五、六千元的负担，似此行业的剥削，人人可畏，所以政府一直在取缔中，在庄先后开设的有茂盛当、德裕当、恒盛当、明记当等，他们的数量少，寄托在其它组织之内。

缸房，陆陈行即其他地方的烧锅米面铺行业在人民生活中是离不开的，即民以食为天。从粮店买回粮食加工成米面或酿造成酒，再转到消费者消耗。他们艰苦细致的加工过程和组织的精密，在经济上储存量也相当大，负责事业也比较广泛。如酿酒制曲炸油加工米面，饲养幼畜、肉畜等，最早时也经营土地耕种。他们的传统风尚敦厚、淳朴、勤俭、节约、事业比较殷实、厚

落，但风度若虚，所以比较基础稳固，在当时经营此种行业的有数十家，如德隆益、天复泉、泉丰永、得聚胜等。

其他酿造熟食、饮食业也因社会的需求，在当时很发达，如醋、酱、糕点业都是当地人制作，规模一般，在选料、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在一度全盛时，也由外地聘用技术人员，翻新花样，有数宗地道门路。食品也曾向外输出，至今为人乐道，如四平头麻叶、密麻叶、糟糕、锅盔等。当时著名食品有隆兴元、清德昌、上三元、德兴荣等，醋酱业如三义泉、广盛泉、天合泉、永溢泉等。而饮食业也较盛兴，经营之技术高超、设备齐全，接待十分周到，八珍异味，较高餐宴亦常开办。当时有第一楼、会丰园、集义园、西玉记、清真寺东馆子等。

绸缎棉布，百杂货副食品贩卖业，当即根据市场需求相继而起，当时最大的商号也在天津、北京、石家庄一带驻有常年买客。采购棉百，也有去苏州等地采购丝绸纺织品等。他们经营方式都是以贩卖为主，由远近或当地贩卖日用品，出售给消费者，一般情况下获利相当微弱，经济来源除自备或入股财东外，也向良号贷款受其剥削，因周转次数多，季节性较少，在市场繁荣中增加瑞色不少，在当时经营棉布业，绸缎百货业的有聚义祥、复聚成、权兴玉、四合一、德兴厚等十余家，其余杂货业如丰胜泉、富成祥、万庆厚等。

铁木手工业也在日益增进，主要制作有车辆及农民和各行业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工具，有许多是传统技术、子承父业。在用户市场中具有相当技艺地位，如长盛炉的镰刀、犁弯等，在当时经营其项目的有长盛炉、庆生澀、永圣炉、双合成等。他们的组织形式有部分师徒性质，来维持技术推广和企业局面。手工业者的传统风尚约束相当严重，人员不多，获利可观，生活相当节约。多数是自立门户，墨守陈规，难求技术的改进，和企业的发展，迷信信仰很深，木工尊奉鲁班，为鲁班社，铁工尊奉老

君，为老君社，岁岁有酬神，演戏之举。

生熟皮扇、皮衣、毡毯业，因北方气候较寒，且出产皮毛，原料的充足兼实用民需，所以这二行业亦相当发达。白羊皮皮衣物销市场，数家作坊终年制作，一冬即可销净，甚至行销北路，毡毯业也销路很大。他们的组织形式也是师徒式的居多，因而又局限了企业前途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

翻砂、铜匠、银炉手饰、靴鞋成衣等行业，都在配合开设，各种行业技艺大多是来源于山西北部，技艺精湛，信用可靠，传授技术也不保守，对市场频填了色彩，填补了人民的需求。

随着市容的繁华，人事往来的频繁，旅蒙业也在增加，根据各行业的性质，开设各种旅店，如农民卖粮住的粮店，客商往来住货店，买卖牲畜住马店，诸如此类。各行业往来的外地商客，都有他自己的落脚地方，而且比较信用、信息灵通，办事容易，开店之家也是远近驰名，很有信誉。他们常言道千里访店，万金可托，当时有三和马店、二何客店、广胜店、天合店、清德店、长盛店等，过来过往的车马大店，还有极简陋的留人小店。

在店的行业中除主要的粮店外，其次的皮毛店、牲畜店因集散的时间差不多，都在秋冬二季，二店有混为一体，所以有皮毛、牲畜店，此种行业在旺季时，如每年的六月到九、十月间，各远近商客接踵而来。从北来的牛、马、羊群，从南来的绸缎布匹、烟茶、百货、互相交流，最远的客商有河北、河南、山东及苏杭一带者，都远道前来进行成批成批的交易，经济价值相当可观，但表现在市场上是盛极一时的。

皮毛也是一样，旺季秋冬最为佳，春夏次之，来庄收买皮毛的商客多系京津或保定一带，收回除供给本地工业生产使用外，大部分是加工出口，细皮细毛都输出国外，牛、羊皮由加工后销出，亦有原料销出的，论其量很大、质也高，在皮毛牲畜这两大交易中，据估计总值占全市镇经济收入50%以上。

关于隆盛庄牲畜的交易，之桥市牙记，所谓桥市，顾名思义在市场交易中能起桥梁作用。如一头牲畜，买卖客之间互不了解，只要一到桥市便可成交。即：叫桥市、中间人叫牙记、买卖价由牙记中裁主持，所谓牙记对牲畜较为熟悉，经验相当丰富，口齿、（岁数）力量、驯服性、病患、出产地道、都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在客主中双方都相信和依靠他们，在双方成交后要给牙记一定报酬，叫佣金，一般以3%计酬，牙记多属游散职业，所得待遇归己，他们的社会组织叫马王社，为当地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组织。凡是牙记都的进社，对社有少量的贡献。他们也有组织章程。由于他们对牲畜交易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当时也是发达的一翼，在经济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也协同牲畜店办理成交。

这时隆庄之繁华，人事往来之频繁，货物流动量也相当可观，这对于当时当地的交通运输无一机动，只凭畜力运输，隆庄既无水运，又无驼运驮子，只能依靠畜力车辆运输，在人的行旅中，部分是骑马，绝大部分是乘坐畜力板车或畜力轿车为主要运输客人的交通工具。当时庄地约有200余辆，很有组织，各自都有往来客户。对一般的商户，他们很负责，且很信用，拉运任何东西都不会有遗失，对异地客人也很照顾，全力响导，所走的路程北至土牧尔台、陶林、南运大同，东至张家口，到处都有他们的住店口与深厚的关系户，对客人十分照顾，负责到底，道德风尚好，信誉高，货物运输少部分是依靠轿车，绝大部分是依靠牛板车，车不出奇，只是一牛拉一车，但他的运输量大的惊人，信誉也完全可靠，车辆最多时，隆庄内外约有一千辆至两千辆，牛板车的载重量有1000斤至1500斤，他们的组织在当时是集结把头形式，每把车在百辆以上不等。只要一承担某单位货物，都能按期运到，损坏赔偿，延期负责，均照约执行。不避任何风霜，晓行夜宿，跋山涉水去完成，为当时的物资流通起了极大

的作用。他们的足迹曾北涉乌兰巴托、恰克图、二连一带，南运大同、雁北一带。

基于上述的各行各业百花齐放，致有满园春色的隆盛庄小集镇。经济方面，资力雄厚，经营者人文荟萃，市容上南北通，车马辐辏，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当时可谓空前盛世。自辛亥革命到民国十年就是如此繁荣景象。迄民国十年后，不时有匪患侵扰，人心欠安，民国十年京绥路通车丰镇。人心趋向进化，有的商人舍隆庄去丰镇经营，特别是火车通达集宁后，北路来的皮毛牲畜已留驻集宁市场，隆庄市场的成交已减去大半，仍可维持现状。自民国十五年以后，由于国内军阀战乱，连年兵燹，兼以民国十七、八年天灾人祸，赤地千里，一时民不聊生，工商业凋敝将一个经济繁荣的小集镇顿减瑞色。工商停业，人伙星散，农村中由于兵燹后的遗患，处处盗贼纷起，人无宁日。二十年后，经政府首先肃清匪患，转危为安，城乡农商又重振家园。而有一般工商业户转集宁开业经营，也有在集宁设立支号，仍以隆庄为本营，这时百业更新，年年丰产，谷物价贱，兼以当时海关不能自立，大量外货进口，物资天天落价，有谷贱伤农之说，兼以粮食进口，使商人无法经营，农民有食无衣，无力购买，白银外流，一般工商业者对当时局面实难应付，只有经济上的损失。从民国二十年到七七事变，由于隆庄各商号动荡大，在经济市场上收利少，元气锐减。

七七事变以后，大地处于冰雪覆盖，黑暗笼罩，人人处于国耻家破，商业停顿。日本侵略华北后，隆庄被占，日方要复业，商人只作应付态度，看风掌舵，以保存生命为宗旨。这时商人处于衰退疲惫状态，经济实力日趋减缩，但也有借机发财，走私贩毒，大兴赌博，妄用乱世好求财。迄1940年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对经济实行彻底封锁，支持侵华战争。各种货物大都封冻，特别是粮食，不准私用，不准私囤。逼迫完全交给日寇，人

民的生活处在饥寒之中，毫无喘息之机，日本侵略军更进一步的暴殄经济，大肆毒化政策，广开赌场，设妓院等，美其名曰俱乐部，对人民敲骨吸髓，荡产倾家相闻，便沦落为孑然一身，流浪街头。日寇又强令农民种植鸦片，秋间收归“国”有，到处开设烟馆，高抬价格，毒化男女老幼，毁家丧身一落不振，毒化人民即如是也。

那时处于日寇铁蹄之下的隆庄，当时人民的生活何能愉快，无有保障，人身何能安宁，市场那能繁荣，只求生命的延续而已。

直到“八一五”的胜利，国内革命战争的交错，情况相当复杂，在此情况下这时隆庄商人还是挣扎，生存，生活和行商、工商经济体系中断，大多是单身独家自立门户求生，无所谓什么商号、宝号，人民实为艰难痛苦之中。正在这时，阳光普照着大地“风扫残云千村亮，喜到隆庄万户春”各族各界人民热烈欢迎隆盛庄解放。交通迅速之恢复，多数商号店铺复业市场又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同盟会在丰镇的活动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是从清光绪末年派其会员来丰镇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山西同盟会会员弓富魁委派杨金中来到丰镇，在城内忻州巷李毡房院内开设了“书子房”，以此为掩护广交社会贤达，联络各方名士。“书子房”成了丰镇同盟会开展活动的秘密联络站，随后弓富魁亲赴丰镇寻访俊杰，先与愤世嫉俗卸江苏嘉定知县归故里的同盟会会员李苑林取得联系，相继又吸收厅署警务长朱尧、启师爷郭福昌，亲兵队长田子功为同盟会会员。

清宣统二年（1910年），同盟会会员王虎臣、李德懋从直隶、山西来到丰镇。同弓富魁一起广泛联络各方上层人士，得到厅署内的曾厚章、李藺亭、郭丙林的同情和支持。王、弓相继到隆盛庄游说巡警第一区区官邓汉臣改编为民军，收服了张占魁、张永善、赵立成、赵善泰、郑作霖、武万义、祁风麟、马有才等组成的“独立队”，这支“独立队”虽良莠混杂，但也组成了一支上千人的民军。当时，隆盛庄已成同盟会活动的集合点。随着同盟会的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壮大，王虎臣遂与李德懋劝降丰镇厅抚民同知章同，章谢绝，并暗令厅警务长聂志贤将王、李拘留，欲加陷害，幸经曾厚章再三谏劝，始得释放，从此，王虎臣等同盟会会员丢掉幻想，一心积蓄力量，欲图推翻章同的反动统治于是策动张占魁举事光复丰镇。

誉称“小状元”张占魁，是隆盛庄饮马河村人。张占魁自幼家庭贫寒，他从小放过羊，扛过长工，为人义气豪爽。

清光绪末年，丰镇厅同知章同依仗其兄高居清廷邮电侍郎之职，作威作福、搜刮民财，使终年辛勤劳动的广大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这种暗无天日走投无路的情势下，张占魁等揭竿而起，聚集起一百多名穷苦民众组成一支“独立队”。张占魁的“独立队”打富济贫，开始活动在隆盛庄、张皋一带地区。清宣统二年（1910年），同盟会会员王虎臣、弓富魁在隆盛庄经巡警区官邓汉臣介绍，结识了张占魁。张占魁接受了王、弓两位的革命主张，改编为民军。从此，这支队伍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

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三十日，继武昌起义后，暴发了太原起义，革命的风暴很快席卷了塞外。王虎臣按照同盟会的指令，召集各路收编为民军的“独立队”首领计议，组成了革命军。大家公推张占魁为革命军的首领，王为军师。十二月八日，张占魁在隆盛庄孤山集合队伍开赴隆盛庄，邓汉臣筹集供应以军饷。九日，张占魁率队准备攻占丰镇城，进军至永善庄。十日，章同派马警哨官、付锦祥出城和谈，以图延缓革命军攻城，等待援兵。十一日，张占魁绑押付锦祥随军行进，于午后，革命军挺进到阮家天同敌军相遇，张占魁当场将付击毙，命令革命军队抢占吉庆梁。敌军正面是管带马进禄率领的150名抬枪队，右翼是西衙典吏聂志贤带领的30名马警，左翼是汪荣九率巡防队向革命军发起进攻，革命军居高临下痛击敌军，两军战斗不到一小时，敌军伤亡甚重，汪荣九率队逃跑，张占魁见敌军已乱阵脚，令革命军一部绕敌军背后偷袭。下午三时许，抬枪队伤亡二十多人，余者弃枪而逃，马进禄、聂志贤急令士兵向城内逃跑。革命军乘胜追击，兵临丰镇城，十二日辰，王虎臣建议张占魁派少数兵力在城的东南、北三面鸣枪佯攻，集中兵力主攻西门。待革命军发起攻击时，西门守敌不战而溃，革命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厅署，光复丰镇城，章同趁混乱潜逃到辘辘把巷姓田的寡妇家

内，藏匿在棺内。革命军进城后，公举朱尧为县知事，严申纪律，社会秩序始复，粮店钱行继续开业，朱尧知事开庭宣布了马进禄罪行，立即枪毙，放出被监禁的无辜群众六十多人。

十二月十五日，革命军首领议定，由朱尧留守丰镇，大队革命军南下与太原革命军会师。王虎臣率先遣队开路，挺进到长城得胜口，与增援丰镇的敌军相遇，敌军是清军统领马锡三带领的七百五十人毅军。两军激战三小时，王虎臣壮烈牺牲。张占魁率领革命军主动撤退。十六日，毅军占领丰镇城，章同大肆搜捕革命军，进行血腥镇压，朱尧及其妻董女士惨遭杀害，丰镇城死难者三十三人，隆盛庄、张皋地区被杀害多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在丰镇历史上是一次壮举。

与此同时，许登弟在同盟会的影响下，也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

许登弟，字平章，丰镇厅双脑包村人，清光绪年间秀才。许登弟曾经以“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道理唤醒民众。他秘密散发传单，支持民众抗税抗差，同官吏豪绅作斗争，受到弓沟一带民众的拥戴。

清宣统二年，丰镇地区持续干旱，农业严重欠收，厅署摊派的捐税极为繁重，穷苦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年秋，许登弟在八苏木举起“为民请命”的义旗，附之者约有千人，以刀矛、火枪为武器组成了一支义军。义军随后占据隆盛庄，扩军到三千之众。

义军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丰镇厅的官吏惶恐。同知章同派其爪牙付锦祥潜入义军，以亲戚关系策动义军首领赵有录叛变，图谋瓦解义军，赵有录大义凛然，严词拒绝。

许登弟率义军大举进兵丰镇城，行军在圪壕洼遭到章同的一千多名清军的伏击，义军处境被动。两军战斗持续进行了一天，黄昏时，许登弟命令赵有录率一部分义军迂回到敌人的侧背夹击，大

败敌人，章同率败军退回城，义军乘势尾随包围了县城。翌日，章同弃城逃跑，义军占领丰镇城。许登弟约束入城义军不得妄取民财，骚扰民间，市民大悦。章同乘义军不备，率大队清军夜间偷袭，义军不备大败，四处走散，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宣告失败。

胡一新烈士生前战友访问记

胡一新同志，丰镇县大庄科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本县著名烈士之一。生前曾先后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连级指挥员、中共清水河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特委宣传部长、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支队（雁北六支队）政治委员等职。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六日，任骑兵支队政委的胡一新，亲率支队骑兵营夜袭右玉杀虎口，歼灭伪李守信部一骑兵连。战斗中，被敌击中左腿膝部，因伤口恶化，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四时十分，牺牲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年仅三十二岁。

一九七七年七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军烈字2号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记载：“胡一新，原晋绥军区一二〇师骑兵支队政委，一九三四年入伍，一九三六年入党，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安葬在延安千柳树店后沟烈士墓。

为征集胡一新烈士的革命史实，县党史办先后于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两次访问了胡一新同志的生前战友，笔者有幸参加了一九八六年的征访。这次访问历时二十多天，行程近万里，先后访问了几位当年与胡一新共同战斗的老同志，初步征集整理了一新同志的大量生平事迹，亦使征访者受到一次难得的革命传统教育。

胡一新烈士，是丰镇人民的骄傲，烈士的业绩，是我们振兴丰镇的动力，更是教育青少年的极好乡土教材。为此，特整理了这次访问记录，以飨读者。

访问第一站：北京

原装甲兵副司令员张文舟同志，曾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时与胡一新在一起。一九八五年我们就曾访问过他。这次，我们下车后，就匆匆赶到装甲兵司令部。接待室的同志告诉说，你们没看人民日报？张副司令员已逝世。我们只好怀着沉痛的心情怅然离去。

张文舟同志在胡一新牺牲后不久，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撰写了《胡一新同志》的纪念文章，介绍了烈士的生平事迹，并高度评价他的这位战友是“忠诚，坚定而刻苦耐劳的优秀共产党员”赞扬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是个“虚心学习，肯求进步的模范”。

访问的第二站：兰州

离开北京后，我们经西安直奔兰州。到达后的当天就赶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去访问李登瀛同志。胡一新受伤后，就是由当时任雁北南山县委书记的李登瀛同志负责安排养伤治疗的。李登瀛同志在他家里接见了我们。

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胡一新同志的？

答：他在晋绥边区特委当宣传部长时就认识了，但不太熟悉，和他熟悉是他负伤以后，晋绥边区特委让我负责照顾胡一新，那时我任南山县委书记，当时也叫右山怀中心县。胡一新伤势不轻，子弹打在左腿膝盖上，膝盖骨都打碎了，不能走路，只好用担架抬。我把他安排在朔县墙风冷韩家村一户可靠的农民家中养伤。当时条件不好，缺医少药，虽然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但疗效不明显，一个多月后，又转到一二〇师卫生部治疗，后又转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他在韩家村养伤期间，我经常去看望他。胡一新这个人革命意志很坚定，也很乐观，是个好同志。

问：胡一新在雁北成家了吗？

答：结婚了，胡一新爱人是平鲁人。

李登瀛同志的爱人接过话说，前不久，回雁北参加纪念李林

的活动时，我们还见过她，她原来叫刘仙云，现在叫刘震，住在西安，你们可以去找找她。

在此之前，我们在访问原六支队支队长刘华香同志时，其爱人就已把胡一新在雁北时结婚的情况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又打听到刘震同志的详细地址，十分高兴。告别李老夫妇后，我们第二天就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第三站：西安

根据李登瀛同志爱人提供的地址，我们找到了刘震同志家。她住在西安市兴庆小区金场，离城很远。上午出发，找到她家时已过中午了。刘震同志刚吃过饭，听明我们的来意后，她拉过一把藤椅坐下，沉痛地谈起了往事。

问：您能谈一谈胡一新的情况吗？

答：我是在平鲁和老胡认识的。那时我在村里是妇女干部，他经常和平鲁一带搞革命活动，渐渐地我们熟悉了。老胡比我大五岁，我今年六十九岁，老胡不牺牲今年七十四岁。他对我帮助很大，给我讲过很多革命道理，我文化低，他为了鼓励我学习，送给我一支钢笔，后来经组织批准，我们在平鲁结婚。当时条件不好，生活艰苦，环境也很恶劣，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少。他担任六支队政委以后，就更没时间在一起了。

问：请您谈一谈胡一新负伤以后的情况。

答：他是三九年十月打厂汉营负的伤，伤在左腿膝盖上。有的资料说，是打杀虎口负的伤，我好象记得他亲口跟我说是打厂汉营负的伤。当我看到他的伤口，就失声哭起来，他却笑着说，哭什么，没什么要紧的，养几天就好了。当他知道组织上准备让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就鼓励我，你放心去吧，我这里有人照顾。当时我既想到延安学习，又想留下来照顾他。经他一再劝说，我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到了延安，老胡也在这年四月转到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

中央党校离和平医院有十几里，还要过延河。我一有时间就去看他，临走时，他总是让他的警卫员用马把我送过延河，他的警卫员也是山西人，只可惜我没记住名字，当看到他的伤口发炎恶化，腿肿得不象样，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他忍着伤口巨痛拍拍腿笑着说：哭啥，革命那有不流血、不牺牲的，我这条腿很快就会好的，就是剩下一条腿，我也要和大家一起打日本呢！

在医院里，他一边治疗一边还读书学习，让来看他的同志帮他买书，时刻盼望能早日出院，重返抗日前线。万没想到，他的伤口急剧恶化，当我跑到医院时，他已昏迷不醒了。老胡牺牲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和平医院召开了追悼会。

问：追悼会是谁主持召开的？

答：当时我哭昏了，不太清楚。

问：胡一新牺牲后遗体安葬在那里？

答：就埋在医院对面的树林里，八五年我去延安还找过他的墓，但没找见，当时也没有立块碑。

问：胡一新和您谈过他结婚以前的情况吗？

答：他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很少谈及个人的过去，他以前的事，我只知道他是个知识分子，在北京念过书，也做过工，还当过兵，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老胡这个人就是这样，回家从不讲组织里的事情，也不议论别的同志，我和他谈对某个同志的看法时，他总劝我，要多看这个同志的优点嘛。我们结婚仅两年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了，对他以前的情况不太了解。

问：您存有他的照片或遗物吗？

答：没有了，他送给我的那支钢笔后来也丢失了，什么遗物也没留下。

说到这里，刘震同志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们告辞时，她一再希望内蒙能给胡一新树碑立传，以教育后人。我们表示一定将她这一意愿转呈给有关领导。

我们回来后，她又来信说，我们走后，她久思不能入眠，心脏病又复发了，但她很欣慰因为烈士牺牲后虽然已数十年，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

离开西安后，我们经成都取道成昆线，抵达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昆明。

美丽的春城昆明，有着令人神往的海底世界石林和秀丽迷人的滇池，我们无暇顾及风景名胜和温泉古刹，下车后即住进昆明火车站的一个简易旅馆内，这种简易旅馆北方是见不到的，就是在南方我也是第一次见。旅馆墙壁和屋顶全是角钢做骨架，纤维板做墙面，玻璃钢瓦做屋顶，室内上下两层床铺，一个房间住数十人，多者上百人。天南海北，大家挤在一起，倒也热闹。行李包裹有个存包处，日夜服务，但要收费。旅馆条件虽然不好，但收费低廉，每天一元，这时已是囊中羞涩的我们，则是求之不得。一九三四年，胡一新为寻找党组织，“途径潼关，川资用尽，曾行乞数百里”，为了到延安，他“抱病甚重，仍夜渡泾水”。比先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有何理由不克服眼前的困难。把包存好后，没顾上小憩片刻，就奔往云南省委。几经打听，终于找到省委大门，但警卫告诉我们，马上就下班了，你们有事明天再来吧。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我们找到省顾委的同志，说明来意后，顾委的同志当即给李启明同志打了电话。他让我们下午三点到他家里，顾委的同志并告诉了住址。

二点半，我们就来到李启明同志的住处，等了一会儿后，按了门铃。一位武警开门让我们进去，他仔细地查看了介绍信和工作证后，请我们在门房稍等。不一会儿，他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宽敞的房间，对一位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老同志说，这就是丰镇来的两位同志。李启明同志亲切地与我们握手，他关怀地询问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我把来的目的告诉了他，他沉思了一下说，我最初认识胡一新是在一九三二年。三

二年七月底，我通过山西省委到了冯玉祥办的汾阳军校我去时胡一新已经是军校的老学员了。我们同在一大队一中队，两人相处很好，从交谈中得知，胡一新是从阎锡山的部队到的汾阳军校，当时汾阳军校是倾向进步，比较适宜搞地下工作的，但党的组织和活动仍然是秘密的。军校内学员和军官两个党支部，我和胡一新不在一个党小组。

问：他是啥时候入党的？

答：胡一新同志的具体入党时间我不太清楚。我知道他在晋军中当兵时，看押过政治犯，受过革命教育和影响，在汾阳军校时他可能就是党员了。

一九三三年，汾阳军校的学员编为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冯玉祥的手枪团扩编为第一师，还有吉鸿昌的十八师，冯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胡一新在二师二团任连级指挥员，此时他肯定是共产党员了，和他经常联系的叫张民权（原在河南，现不详）。同盟军成立后，我们参加了收复多伦等多次战斗。同盟军失败以后，原部队中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都撤走了，北平党组织派人到独石口，指示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暂时先留在部队，我和胡一新当时都没有暴露身份，就留下来。后来和北平党组织的联系也中断了。我和胡一新商量，准备拉一部分队伍到商都一带打游击，胡一新说不行，人太少了，连地方反动武装都难以对付，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胡一新只好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回到了他的家乡丰镇县大庄科。从他家境看是个相当于中农水平的家庭，我们在大庄科住下以后，先了解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当时大庄科前面的一个村子里有两个党员，我们当时想在丰镇开展活动，但没有经费。一九三四年九月，我和胡一新又离开他的家乡，一起到了繁峙定襄一带的大营镇。在那里，胡一新找到一个在晋军中当兵的同学，利用这个同学的关系，给我们开了一张军用通行证，两个人几经跋涉，历经艰辛到了西安。到西安以后，我们就同西安市委

接上了关系，一起去了杨虎臣办的步兵训练班。在步训班里，我和胡一新、张文舟组成了临时党支部。三四年十二月或是三五年一月，经西安市委介绍，我和张文舟第一批离开步训班到了延安，胡一新是三五年的七、八月份第二批也到了延安。此时苏区正搞“肃反”，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都受到审查。我们到了以后，也成了审查对象。不久，中央红军北上来到陕北，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我们都分配了工作，胡一新被分到抗日救国会任秘书。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他又被派往晋绥去了。

问：请您谈谈胡一新受伤住院时的情况？

答：胡一新受伤住院期间很克己，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问：胡一新牺牲后安葬在那儿？

答：就在延安和平医院对面，没有墓碑。

访问就要结束了，我们起身告辞时，李启明同志有些激动地说，胡一新是个好同志，你们要把他的事搞清楚，搞准确。

我们就要走了，李启明同志把我们送到门口，我们请他有时间再来丰镇看看，他表示感谢，并说有机会一定去。

此次访问，可以说是来去匆匆，日夜兼程，是什么力量的鼓舞，一下子似乎说不太清。一路上没有游山逛水的兴致，更无暇顾及风景名胜，即使是华山的险峻，峨眉的清秀，乐山的神秘，石林的奇观，虽然都近在咫尺，却只能在车上一饱眼福。只是在兰州，我们抽空欣赏了黄河的雄姿，黄河，象征着中华民族，望着那奔腾翻滚的黄河水，就想到胡一新烈士以及无数的革命志士。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正如张文舟在《悼胡一新同志》一文中所说：“他的光辉历史与革命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黄河滔滔，后浪推前浪，长流不息。

烈士英名，一代传一代，永垂青史。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丰镇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92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